

第 18 卷 第 4 期 2025 年 12 月

(本期文章选译自美国波士顿学院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第 122 期)

国际高等教育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主办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第 18 卷第 4 期 2025 年 12 月

Vol. 18, No. 4, December, 2025

国际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中的新分析—产业综合体：数据、治理和权力.....	1
当数据无法兑现承诺：重新思考全球高等教育中的数据化.....	4
国家人工智能安全战略：对大学的影响.....	7
大学—科学模式与全球大科学：科研发展的一百年.....	10
非洲高等教育的国际科研资助：风险与收益.....	13
私立高等教育：模式、差异与区域趋势.....	16
非洲私立高等教育：根源、趋势和挑战.....	19
哈萨克斯坦私立高等教育：30 年的发展与监管.....	22
压力之下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和人口下降.....	25
巴西私立高等教育：公平与远程教育.....	27
德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与发展.....	30
风向转变：印度和中国学生的流动趋势.....	33
是时候再谈谈签证欺诈问题了.....	35
撤销国际化的危险	37
绘制（但尚未解决）科学传播危机的版图.....	39
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出版、合作与引文趋势.....	42
掠夺性出版：动因、后果和道德困境.....	45
学生贷款还是所得税：致力高等教育融资改革.....	48
欧洲的非学位教育：终身学习的新机遇.....	51

注：本期文章选译自美国波士顿学院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第 122 期。

高等教育中的新分析—产业综合体：数据、治理和权力

克里斯·R·格拉斯、杰拉尔多·布兰科

克里斯·R·格拉斯 (Chris R. Glass)：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教育领导与高等教育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Higher Education) 教授

电子邮箱：glassch@bc.edu

杰拉尔多·布兰科 (Gerardo Blanco)：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副教授、学术主任

电子邮箱：blancoge@bc.edu

全球各地的大学正悄然将自主权拱手让给少数几家私人数据公司，这一趋势可能构成高等教育历史上最重大的权力转移之一。

在这场变革的前沿，是《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以下简称为THE)，该机构从一份教育类杂志，演变为大学排名机构，再到如今的数据提供商与咨询机构，其发展历程正好体现了新型“数据帝国”的崛起。THE 由欧洲私募股权公司 Inflexion 所拥有，目前掌握着来自 155 个国家、2,860 所院校的 472,694 条数据 (2025 年排名)。然而，这庞大的数据资源仅是 THE 不断扩张版图的一个侧面。

THE 年营业收入达 9,570 万美元，拥有 315 名员工，并通过多项战略性收购在多个领域扩大其影响力。它最近收购了全球最大的教育部长会议“世界教育论坛” (Education World Forum)，该论坛在 2023 年吸引了 120 位教育与技能部长参加。除此之外，THE 还收购了美国的高等教育新闻平台 Inside Higher Ed 以及商学院资讯平台 Poets & Quants。通过这些战略举措，THE 已在新闻报道、数据分析、学生招生、商学教育情报以及部长级教育政策参与等领域实现了显著扩张。

这种权力的集中并非 THE 独有。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 (Quacquarelli Symonds, 以下简称 QS) 近期收购 HolonIQ 的事件，标志着又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并——催生了一个服务于 6,950 家院校与企业客户的教育情报巨头。两家公司均实现了显著增长。合并后的机构在全球 15 个办事处拥有近 900 名员工，整合了 HolonIQ 的先进人工智能驱动分析平台，以及其包括苹果 (Apple)、谷歌 (Google)、微软 (Microsoft) 等科技巨头，贝莱德 (BlackRock)、高盛 (Goldman Sachs) 等金融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 (IFC)、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和盖茨基金会 (Gates Foundation) 在内的高端客户群。

教育治理的私有化：从排名到监管权力

这些并购活动凸显出主要排名机构，如 THE、QS 和“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以下简称 ARWU) 如何突破其传统的大学排名职能，转型为复杂的数据分析企业，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并维护着庞大的高校数据资源库。

在高等教育领域，数据分析已从一种辅助性工具转变为推动高校战略的核心驱动力，标志着大学治理模式与传统学术治理之间出

现重大分野。各大学迅速引入了源自企业界的商业智能系统与信息仪表盘，而学习平台与学生档案的数字化进程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量机构数据。

这种治理方式的转变不仅涉及数据公司，也包括传统的咨询公司，形成了私营部门对高等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强大网络。麦肯锡（McKinsey）、德勤（Deloitte）、安永（EY）、毕马威（KPMG）和普华永道（PwC）等公司，正战略性地将自身定位为“教育未来的设计师”，不断发布关于“大学的未来”的重要报告与框架，越来越多地影响高校的战略规划。

根据澳大利亚全国高等教育工会（National Tertiary Education Union）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在澳大利亚大学管理机构的 545 个职位中，143 个由企业高管或顾问担任，其中约有 30 位顾问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毕马威、普华永道）。

QS 近期还发布了一份题为《高校如何实现未来准备》（*How ca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ecome future-ready?*）的报告。“为未来做好准备”似乎意味着依托 QS 的数据支持来指导高校的战略决策——从资源分配、学生支持服务到学术项目开发，无不以数据为依据。

这一从学术决策框架向商业决策框架的转变，引发了关于大学自主权和教育治理本质的深层次问题。

科技公司作为地缘政治参与者

这些新的大数据权力中介的崛起，也反映出地缘政治影响力更广泛且深刻的结构性转变——科技巨头正日益成为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当今的多极化世界秩序中，这些数据巨头已崛起为“影子监管者”，其影响力往往超越传统国家或学术机构。

以 THE 近期收购“世界教育论坛”为例，这一战略举措使 THE 从单纯的数据分析提供者转变为连接各国政府与全球教育市场的重要中介。同样地，当 QS 旗下的 HolonIQ 同时为高校及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等科技巨头提供服务时，其角色已不仅仅是数据分析，而是在塑造高等教育与科技产业人才需求之间的接口。

这种权力的集中催生了所谓的“分析—产业综合体”（analytics-industrial complex）——一个自我强化的生态系统，其中，私人企业同时承担制定评估指标、控制营销平台、提供绩效分析、并参与政策讨论的多重角色。其影响力在各高校及国家对排名体系的反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QS 在 2024 年排名中将“学术声誉”指标权重从 30% 降至 20%，并引入新的就业指标后，各大学迅速成立了专门的“就业能力办公室”；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甚至通过“2030 愿景（Vision 2030）”等政策，将全球排名直接纳入国家战略中。

《自然》（Nature）期刊近期的一项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现象，显示国家层面的高教改革举措可使大学在 QS 和 ARWU 排名中平均上升 12.1 至 17.7 位。

这一趋势的深远影响在于：这些公司不仅在衡量教育质量，更在定义教育质量。这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馈循环——同样的机构既负责排名，又为大学提供战略咨询，并同时充当大学与潜在学生之间的媒介，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私人教育治理体系。

引导新的教育秩序

这种“双重转型”，即教育治理的私有化与科技公司作为地缘政治参与者，可能是当代最重大的权力再分配之一，它在“数字帝国”时代对学术自治提出了根本性挑战。数据

公司作为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正以超越传统国家边界的方式重塑全球权力格局。

“分析—产业综合体”实际上已在全球高等教育中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监管。当像 THE 这样的公司同时掌控排名体系、提供战略咨询，并召集教育部长会议时，它们形成了一个超越传统监管框架的自我强化影响圈。这标志着权力从公共治理向私人治理的深刻转移——商业机构日益在缺乏民主问责的情况下决定教育标准与优先事项。

此外，这些教育数据帝国的影响力已可与各国教育部相抗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 THE 能够同时召集 120 位教育部长，并掌控庞大的数据资源与分析能力时，它所行使的“软实力”已接近甚至超越传统国家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全球组织的影响。

更具关键意义的是，这一体系对学术自我治理的基本假设构成了挑战。大学如今处于一种不对称关系中——它们免费提供机构数据，却必须依赖昂贵的商业分析服务来解读和利用自己的信息。这引发了紧迫的问题：高校如何在新的权力结构下保持其作为知识创造与批判思维机构的本质？

这些相互交织的挑战揭示了全球高等教育权力结构的根本重组。商业数据企业如今已演变为超国家实体，其影响力超越了传统治理框架，却几乎不受民主监督。这场转变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数字帝国时代，大学的制度自主权与学术自我治理究竟该如何延续与捍卫。

当数据无法兑现承诺：重新思考全球高等教育中的数据化

詹娅·科姆列诺维奇

詹娅·科姆列诺维奇 (Janja Komljenovic)：英国爱丁堡大学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副教授

电子邮箱：j.komljenovic@ed.ac.uk

在当代经济与社会中，数字数据被普遍视为一种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源。在高等教育领域，各利益相关方普遍相信，通过收集、分析、结构化、管理及运用数据及其产出——如分析结果、数据面板或评分体系——能够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致力于提升数据的实用价值，并努力在战略与运营活动中成为“数据驱动型组织”；教育科技 (EdTech) 公司则试图通过收集的数字数据实现商业变现，即使数据具备经济价值；政策制定者则期望基于实时数据做出决策。然而，在实现高等教育领域“数据价值”这一愿景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误解与挑战。

本文以英国的大学、教育科技初创企业以及教育科技投资者为研究对象，识别出高等教育数据化的五项主要挑战。“数据化” (datafication) 是指对社会与自然世界进行量化，并以机器可读的数字格式加以呈现的过程，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复杂性的简化。鉴于所研究的教育科技公司与投资者活跃于多个国家和地区，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跨国适用性。

数据并非天生具有价值

在大学、教育科技公司以及教育科技领域的投资者之间，普遍存在着对“数据具有内在价值”的一致信念。然而，这种价值并未真正实现，至少未达到各利益相关方所期

望的程度。不同利益相关方对“数据价值”的理解各不相同。一方面，大学希望通过数据的价值来提升学生体验与行政管理效率，实现学习个性化与流程自动化；另一方面，教育科技公司则尝试通过多种策略将其收集的学生与教职员工数据实现商业变现。无论在何种情境下，使数据“有用”或“有价值”都被证明是困难且资源密集的过程。换言之，数据并非天然有价值，而是需要通过人为努力赋予其价值。

良好的数据实践成本高昂

数据处理需要技术、资金与人力资源。从大学的角度来看，数据化话语往往承诺“提效降本”，但研究表明，数据化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劳动投入。这包括学术与行政人员录入和整理数据、测试与调整数据输出、改变工作方式等。此外，还需要具备新技能与新岗位的人员，例如数据科学家、信息技术开发人员、项目经理与供应商管理人员，这些职位的设立同时也要求组织结构的调整。数字基础设施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包括迁移至大型科技企业的云计算平台。类似地，教育科技公司同样在数据实践的成本上面临困境，尤其是在进行超越描述性统计或简单比较的复杂数据分析与产出时。更进一步地，如果它们希望开发跨院校的数据洞见，往往需要约五年的时间来构建大型数据库。

由于教育领域的投资回报率通常被认为低于其他行业,这些公司在吸引高质量数据处理投资方面也面临巨大挑战。

并非所有数据都具有实际价值

并非所有数据产出都是有用的。许多大学内部成员认为,部分教育科技产品生成的数据结果对教学与学习并无实际帮助。此外,一些数据产出并不能准确反映其声称代表的内容。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所需的指标本应不同,但教育科技公司往往以相同的方式推广数据指标。正如一位大学成员所言:“仅仅因为数据可以被收集和分析,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被收集和分析。”事实上,教育科技公司经常尝试不同类型的数据输出,以寻找愿意为其付费的目标客户。不同的数据指标和结果可以被设计并推销给不同的对象,这种做法有时甚至可能损害其他相关方的利益。例如,一个显示学生访问指定阅读材料的次数及其停留时间的指标,可能被大学领导层用作评估教师教学表现的依据。然而,学生访问电子文本的频率是否真能有效衡量教师表现,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数据产出具有影响性

教育科技公司最常见的用户数据变现方式是“产品数据化”(datafying products),即在原有产品中整合数据输出功能。例如,一个视频会议平台可能会增加对通话描述或参与者互动情况的分析功能。如前所述,不同的数据输出与指标可以针对不同受众生成,包括大学以外的主体,如出版机构(例如:哪些书籍被阅读、阅读程度与方式)以及政府机构(例如:特定人群拥有哪些技能或缺乏哪些技能)。这些数据产出具有“表演性”(performative),即会引发社会行动

并产生实际影响。其影响可能体现在多个层面:院校层面,例如大学依据算法评分决定是否对某位学生进行干预;商业层面,例如出版商根据阅读数据(可能受行为引导影响)决定出版哪些学术著作;政策层面,例如政府依据特定数据做出政策决策。因此,关键在于思考:这些数据产出由谁生成?出于何种目的?采用何种方式?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

数据实践并非民主过程

高等教育领域的数据化不仅在技术与法律层面面临挑战,更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分歧的复杂过程。许多人持续对数据实践表达担忧。学者们常指出,既有的教学与学习方式(例如,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紧密互动、形成性评价等)往往比大规模数据收集与数据产出(例如,学习分析)更具教育意义。然而,那些提出质疑的人常被指责为“反对进步”。当各种数据指标被强制施加在个人身上,而相关人员却无法感受到其带来的益处时,数据化注定无法实现其目标。这揭示了高等教育内部关于“我们需要怎样的数据化、为何而为、应如何实施”等问题所存在的复杂张力与不同动机。若缺乏高等教育共同体内部开放而民主的讨论与共识,数据化改革将难以兑现其所承诺的成效。

前进的方向

研究表明,当数据化由政府、教育科技公司或高校领导自上而下地想象并强制施加于教职员工和学生时,往往难以产生积极成果。相反,以下做法可能更具建设性。首先,教育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必须具备合法性与正当性,使高校师生不至于感到被利用。其次,数据化在提升行政流程与运行效率方

面的价值应得到充分认可,例如根据使用或阅读趋势优化软件与出版许可的采购与成本分配。再次,数据产出或“数据化产品”的推广必须真实、有效、可验证,同时允许使用上的多样性、灵活性与个体自主权。任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的数据产出都应有明确且经共识确定的目的,无论其层级或规模如何。此外,数据化的试验性探索固然重要,但若其实践未能为用户创造价值,应当具备可回退机制。教育科技公司应以尊重的态度与大学合作,支持高校的使命、文化与社群发展。最后,花时间放慢脚步,负责任地进行创新、对产品进行充分测试,并投入充足

资源以完善数据化实践,是确保高质量数据化发展的关键。

注:本文基于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于2024年发布的报告《高等教育中的教育科技——来自“大学和独角兽:在高等教育行业建立数字资产”项目的实证结果》(*Edtech in Higher Education: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the Project ‘Universities and Unicorns: Building Digital Asset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Industry’*)。

国家人工智能安全战略：对大学的影响

克里斯·R·格拉斯、塞夫吉·卡亚-卡什克奇、埃格利斯·查孔·卡梅罗、叶卡捷琳娜·米娜耶娃

克里斯·R·格拉斯 (Chris R. Glass)：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教育领导与高等教育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Higher Education) 教授

电子邮箱：glassch@bc.edu

塞夫吉·卡亚-卡什克奇 (Sevgi Kaya-Kaşıkçı)：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箱：sewgikaya@gmail.com

埃格利斯·查孔·卡梅罗 (Eglis Chacon Camero)：美国波士顿学院教育领导与高等教育系博士生

电子邮箱：chaconce@bc.edu

叶卡捷琳娜·米娜耶娃 (Ekaterina Minaeva)：美国波士顿学院教育领导与高等教育系博士生

电子邮箱：minaeva@bc.edu

研究型大学正在应对一个由国家人工智能 (AI) 与技术安全政策深刻塑造的复杂且不断演变的国际合作格局。2020 年至 2024 年间，许多国家陆续出台或更新了本国的人工智能战略，明确要求大学在推动国家 AI 能力建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一轮以 AI 为核心的政策浪潮，标志着大学与国家战略优先事项关系的新阶段——从冷战时期的科研限制到“9·11”事件后的安全监管。然而，如今 AI 监管框架的广度与深度，反映了政府对大学研究在国家竞争力与安全体系中核心作用的重新定位。

尽管 AI 研究首当其冲地受到政策审查，如《推进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备忘录》(Memorandum on Advancing the United States'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但新的安全框架也正在影响从气候科学到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大学领导

者如今必须系统地评估国际合作中的多重风险因素——从数据敏感性到技术转移风险。这一趋势较以往的学术交流时期更为严格，学术活动虽从未完全不受限制，但过去享有的自主性和非正式监管已大幅减少。

学术开放性与国家安全

当下研究型大学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学术开放性与国家安全考量之间日益突出的张力。虽然出口管制与科研监管早已存在，但当今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国际科研合作，尤其在欧美国家，受到更高强度的审查。

这种紧张关系在中美科研合作中尤为明显。美国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 以及针对高性能计算与半导体技术的出口限制，阻碍了联合研究与学术交流。西方政府对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Digital Silk Road) 倡议加强审查，担忧相关技术可

能被双重用途（dual-use applications），并涉及数据安全与知识产权风险，尤其是在与华为和中兴合作的 5G 网络和智慧城市项目中。

类似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也在蔓延。澳大利亚高校已根据政府防范外部干预的指导方针，调整科研安全框架；日本亦强化网络安全管理，设立专门机构以监督敏感科研合作。这些举措标志着高校国际合作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从开放协作逐步过渡到系统性风险评估与制度化安全审查。这一变化反映出全球科研体系在平衡国际合作收益与安全风险方面的新格局。

为此，各高校普遍采用“有管理的开放性”（managed openness）模式，以在科研合作与安全要求间取得平衡。这类框架通常包括合作伙伴筛查、数据共享协议透明化，以及定期安全审计。与此同时，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成为新焦点，各机构需同时应对不同地区的合规要求，例如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到各国的本地法律框架。成功的应对策略通常依赖稳健的治理结构、明确的国际合作评估机制，以及强化的合规执行能力。

机构自主性承受压力

国家 AI 研究经费与大学机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正成为全球范围内愈发突出的议题。各国政府在增加 AI 领域投资的同时，往往附加与国家战略目标相符的条件，从而对学术独立构成压力。这种动态在不同地区表现出差异，反映出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国家优先方向。

在亚洲，政府对科研议题的主导更为直接。中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Plan*）即为典型，研究型大学须依照国家战略执行科研任务。印度的国家 AI 战略（*National AI Strategy*）旨在推动 AI 在各领域的开发与应用，以确立全球领导地位；然而，印度理工学院（IITs）需在追求国家 AI 目标与保持国际科研合作间取得平衡。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在总体上保留了较多机构自主权。美国高校虽保持显著的学术独立性，但联邦科研经费的导向性仍可能间接影响研究方向。欧洲高校则面临多层次的治理体系：在享受欧盟“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计划资金支持的同时，必须兼顾欧盟范围的法规（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及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与各成员国政策，形成复杂的跨国合作环境。

非洲高校呈现多元模式：有的侧重与西方大学合作，有的深化与中国的科研联系，也有高校通过“应用科学伙伴计划”（*Partnership for Applied Sciences*）推动非洲区域协作。拉丁美洲的“拉美人工智能研究网络”（*Latin American AI Research Network*）则以区域能力建设为导向，兼顾合作与自主。这些差异性体现了制度自主性在地方发展优先事项中的多重维度。

人才流动与招聘困境

全球 AI 人才竞争加剧，给大学的人才引进与留任带来挑战。顶尖研究型大学在维持国际科研团队方面遇到困难，原因包括签证限制、安全审查要求及来自产业界的激烈竞争。在部分国家，国家安全框架要求 AI 研究岗位必须由本国公民或永久居民担任，从而进一步缩小了人才来源。

这些因素正以复杂方式重塑全球人才

流动格局。中国正大力发展本土 AI 教育体系；印度推出“人人 AI”（AI for All）计划，并与全球科技企业合作建立能力建设平台；巴西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通过“拉美人工智能研究网络”等区域合作项目，培育 AI 人才；欧洲通过“欧洲 AI 奖学金计划”（European AI Fellowships）吸引人才；东盟（ASEAN）框架则推动区域内的跨国人才流动。

然而，尽管区域性努力不断推进，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许多高校仍在基础设施、资金与人才流失方面面临长期困境。高性能计算与数据基础设施的高成本，使资源充足的大学与新兴经济体高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与能力建设研究所（UNESCO IESALC）的比较政策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正越来越多地以市场准入与数据资源为交换，换取 AI 技术能力的获取，这可能加深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中心—边缘”（center - periphery）结构的不平等。

同时，地缘政治变动也影响了传统的学术流动模式。许多亚洲顶尖大学正致力于通过研究生项目与产业合作构建国内人才培养体系；欧洲高校则强调“可信赖 AI”（trustworthy AI）与伦理框架，吸引重视学

术诚信与道德标准的研究人员。

探索“负责任国际化”

当下学术界普遍倡导的“负责任国际化”趋势，为高校带来根本性挑战——在保持开放科研交流的同时，应对日益增长的安全监管压力。这一紧张关系映射出国际高等教育的更广泛变迁：全球合作的传统理念正与国家安全优先事项产生竞争。欧盟提出的“尽可能开放、必要时关闭”（as open as possible, as closed as necessary）原则为高校提供了一种框架，但关键问题仍在于——谁来界定开放与限制的边界？这些界定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知识生产？

这一形势要求高校领导者与更广泛的高等教育共同体采取切实行动：首先，高校领导层应与教师及国际合作伙伴协商，制定清晰的风险评估机制，在维护学术自由的同时确保安全合规，从被动遵守转向主动治理；其次，大学应强化区域科研网络，以维持在双边合作受限情况下的多边学术活力；最后，高校应积极倡导兼顾安全与公平的政策框架，既回应合理的安全关切，又防止削弱学术核心价值或扩大全球 AI 研究的不平等。

大学—科学模式与全球大科学：科研发展的一百年

大卫·P·贝克、贾斯汀·J.W.·鲍威尔

大卫·P·贝克 (David P. Baker)：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社会学、教育与人口学教授、卢森堡大学客座教授

电子邮箱：dpb4@psu.edu

贾斯汀·J.W.·鲍威尔 (Justin J.W. Powell)：卢森堡大学 (University of Luxembourg) 教育社会学教授

电子邮箱：justin.powell@uni.lu

当代科学发现的非凡速度在新冠疫情期间得到了充分体现——全球科研人员迅速协作以理解新型冠状病毒并研发疫苗。这种研究加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全球科研体系长期投入的结果，其特征是跨国、网络化和高度协作的科研形式，我们将其称为“全球大科学” (global megascience)。

我们近期出版的著作《全球大科学：大学、科研合作与知识生产》 (*Global Megascience: Universities,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24 年出版) 追溯了一项具有变革性理念的历史演进：通过扩展大学职能，将教学与科研使命深度融合，从而培育出一个全球化、高度协作、并出乎意料强大的科研体系。该书将 20 世纪大学发展的历史叙事与基于独特大样本科研论文数据的科学计量分析 (scientometric analysis) 相结合，涵盖自 1900 年以来全球学术期刊的演变。我们在其中探讨了反事实模型，审视“卓越计划” (excellence initiatives) 的反讽结果，并剖析了威胁大学—科学模式 (university-science model)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

截至 2023 年，全球科学出版物数量已超过约 400 万篇，其中绝大多数由大学科研人员

参与。这一爆炸式增长充分显示了以大学为基础的全球科研产能与协作潜力。从 1900 年仅有数所研究型大学起步，如今科研活动已遍布全球 3.8 万余所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培养了全球不断增长的青年学习群体。科学发展的“极限”仍未到来，当代科研生态正持续繁荣，这一切得益于连接高等教育与科学发展的教育与文化发展。

教育革命与“大科学”现象

“大科学”现象的核心，是教育革命带来的文化转变——它使大学从单纯的教学机构转变为科研、问题解决与社会参与的中心。过去一个世纪中，教育普及使社会更广泛群体得以进入大学，全球近 40% 的年轻人如今正接受高等教育。这种教育民主化，再加上研究生流动性增强与性别平等的提升，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受过科研训练并致力于推动科学探索、跨越边界的研究者。

随着大学在制度上整合教学与科研功能，科研逐渐成为其核心使命。此一转变不仅确立了大学作为科学研究中心的地位，也构建了跨学科、跨国界的知识交流平台，实现了前沿知识的代际传承。

大众教育与科学进步的结合催生了前所

未有的全球研发网络。伴随各国研究型大学的建立，科研出版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仅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与医学领域，就拥有近 1 万种高影响力学术期刊，为学者提供了最新科研成果的平台，保障研究质量并促进全球知识交流。

大学：全球科学时代的科研平台

大学仍是科学发现的核心，其教师贡献了全球每年约 85% 至 90% 的科研出版物。这些机构促进跨学科与跨国合作，并经常与研究机构或产业界建立合作关系。

互联网的诞生，最初由大学为促进科研合作而开发，如今彻底变革了跨国与跨机构的协作模式。如今，科学家能够实时跨洲合作，突破了地理边界的限制。这种连通性极大提升了科研产能，使数十万名科学家能够共享数据、协调研究。科研人员的持续增长与技术的飞速发展共同推动了科学产出的指数级增长，并加速了突破性发现的出现。

虽然部分批评者称当前的论文数量激增为“科研通胀”（hyperinflation），但分析表明，这反映的是科研产能的真实扩张，而非质量下降。大量科研成果确实带来了挑战，例如如何高效整合与验证数百万篇论文的研究结论。然而，先进的人工智能（AI）工具正为此提供变革性解决方案，使学者能够更有效地导航庞大的知识网络，展现出这一技术的潜力与深远影响。

社会的“科学化”

教育革命与大学科研的协同效应带来了一个深远的结果：社会的“科学化”，即科学探究能力扩展至人类事务、生命、地球乃至宇宙的方方面面。随着科研活动的制度化进程不断深化，世界各地的研究型大学逐渐采用

了相似的组织框架。这一模式自德国传播至北美、东亚及全球其他地区，使各国大学在知识生产中的角色趋于一致——在融合本国文化与历史的同时，采纳了全球性的科研组织模式。

这种“大学—科学模式”（university-science model）激励了全球各国对科学的投资，使许多国家首次在历史上成为全球知识体系的贡献者。以巴西、伊朗和土耳其为例，这些国家的大学如今已在国际主要科学期刊（多以英语为主）上发表研究成果。即使是卢森堡、卡塔尔等小国，也大幅投资科学研究，其大学已成为全球科研网络的重要节点。过去几十年，原本科研能力有限的大学与高等院校科研活动显著增长，与两年制学院教师的合作项目也不断增加。尽管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在越来越多非教育机构中开展，但这些机构仍普遍与大学研究者保持紧密合作，借助大学在国际科研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与资源。

科学研究的范围如今已超越传统强国与精英大学，越来越多的新兴研究型大学也在为全球知识体系贡献力量。由此，全球科学知识的总量与多样性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新高度，而大学依然是这一全球发现与合作体系的中心。

“大科学”的历程：全球传播与在地化

本研究的前身著作《科学的世纪》（*The Century of Science*，鲍威尔、贝克与费尔南德斯合著，2017 年）以案例研究方式分析了不同国家的“大科学”能力建设，探讨了知识生产体系如何适应多样的文化、历史与政治语境。起源于德语区并传播至美国的大学—科学模式，如今已被世界各地采纳，从欧洲扩展至亚洲乃至全球。各地区在采纳过程中进行

了本土化调整，突出国家或地区的优先议题与特点，资金来源亦兼具公立与私立结构。那些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科研基础薄弱的国家，如今已能稳定地参与全球科学知识流通，显示出高等教育在促进知识转移与构建科研共同体方面的巨大潜力。

对全球科研流动的分析揭示了“大科学”合作的集体特征，即这是一个持久且富有影响力的发现网络。这彰显了高等教育在知识生产中的变革力量与持续价值。

维系未来的“大科学”

“大科学”是全球科学家共同追求复杂

问题答案的累积成果。理解其起源与发展，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其辉煌成就，也使我们更能应对当下的挑战，例如知识的可重复性与整合性、人工智能在科学中的伦理维度，以及在研究产出激增的环境中维持高标准科研质量的难题。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与气候危机等全球性挑战，理解支撑“大科学”的文化与教育基础，对于确保其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归根结底，“大科学”体现了教育与科学发现之间的强大互动，突显出大学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核心作用，也展示了人类社会通过合作不断推进知识前沿的潜能。

非洲高等教育的国际科研资助：风险与收益

恩根格·兰森·坦尤

恩根格·兰森·坦尤 (Ngenge Ransom Tanyu)：《社会科学电子期刊》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主编、非洲在线与出版图书馆 (Africa Online & Publications Library) 创始人兼执行主任

电子邮箱: ngengetanyu@africaopl.org

对非洲 100 所顶尖大学的分析表明，大学大约 40%—60% 的经费来自非洲以外。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是资助乌干达及其他非洲国家公共卫生与农业研究的诸多重要外部资助方之一；威康信托基金会 (Wellcome Trust) 为生物医学与公共卫生项目提供经费；欧盟“地平线 2020” (Horizon 2020) 为非洲与欧洲高校开展的跨学科研究提供资助。来自专项资金与合作关系的经费往往附带具体的成果与产出要求。例如：合作研究需在论文上署名合著，并预期由“全球北方”的研究者担任第一作者或共同作者；研究议题需与北方资助方的战略利益保持一致；要求在高影响力期刊发表论文（而“全球南方”的学者通常获取渠道更为受限）；以及共享知识产权等条款。以“伊拉斯谟+” (Erasmus+) 为代表的能建设项目同样强调对学者的培训与回归本校后的再融入。此类外部资助趋势凸显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引发对非洲大学科研议程自主性与长期可持续性的担忧。外部资助是否始终出于善意并聚焦非洲利益？是否真正契合非洲的发展优先领域？它是在提升高校自主性，还是加深依赖循环？本文通过梳理斯坦陵布什大学 (Stellenbosch University)、约翰内斯堡大学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内罗毕大学 (University of

Nairobi) 与马凯雷雷大学 (Makerere University) 的经费数据，阐释外部资助的运行机制及其对非洲高等教育的影响。

肯尼亚与乌干达

内罗毕大学以在科研经费方面高度依赖国际伙伴而闻名。主要资助机构包括由校长帕特里克·费尔科伊恩 (Patrick Verkooijen) 领导的“全球气候适应中心” (Global Center on Adaptation)。费尔科伊恩教授是“非洲(气候)适应加速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该计划已为非洲带来逾 60 亿美元的弹性投资。尽管他在气候适应领域的专业知识十分宝贵，其担任校长也具战略意义，但其荷兰籍背景与国际网络在非洲公众中传递出矛盾信号。在此种外部影响明显存在于内罗毕大学的情形下，不禁使人追问：当洛克菲勒基金会、三菱公司以及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为内罗毕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提供奖学金时，其代价为何？

马凯雷雷大学认识到科研在解决乌干达国家发展需求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其官网信息显示，2019—2020 财年，学校通过“研究与创新基金” (Research and Innovations Fund) 获得特别资助 300 亿乌干达先令 (约 810 万美元)。该举措源于校方与乌干达政府之间的战略磋商，旨在支持

高影响力的研究与创新。然而考虑到乌干达政府本身高度依赖外援，这笔资金能否真正产生结构性改变仍待观察。除此之外，学校仅将内部教职工创收的 1% 用于科研，主要依赖与国际发展机构的合作，如挪威发展署（NORAD）、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研究合作署（Sida/SAREC）以及美国纽约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等长期伙伴。校方网站列示的 6 个项目中，仅 1 项由非洲内部资金支持，其余均为外部资助，例如，区域作物改良卓越中心（MaRCCI）获得世界银行 2017—2022 年的经费；Kiira-EV 项目可追溯至 2008 年“车辆设计峰会”，当时由麻省理工学院牵头，汇聚 35 所顶尖研究型大学共同研制五座插电式混合动力车“Vision 200”。由此，马凯雷雷大学堪称高度依赖外部经费与伙伴关系的典型案例：科研能力得到提升，但独立性面临风险。

南非的情况

斯坦陵布什大学在 2023 年财报中披露，其“第三来源收入”（主要为外部资助）为 13 亿南非兰特（略低于 7,000 万美元），占学校年度经常性收入的 32.2%；相比之下，第一来源收入（政府补助）仅占 29.6%，第二来源收入（学费）占 22.1%。外部资金对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至关重要，如泰格堡校区耗资 12 亿兰特的生物医学研究院。然而，由于此类外部资助多为项目制且有时间界限，学校在可持续性方面面临挑战。

约翰内斯堡大学在 2023 年同样实现外部科研经费大幅增长：当年科研收入达 9.342 亿兰特，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主要来源于国际资助方，如威廉信托以及与金砖国家相关的全球学术网络。外部资助占学校收入的 32.2%，凸显国际捐助者在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等

前沿研究中的关键作用。该校全球合作部 2024 年工作总结显示，学校学术事务部门已成功签署 15 份合作协议，伙伴包括德国霍恩海姆大学（University of Hohenheim）、斯洛文尼亚新戈里察大学（University of Nova Gorica）、芬兰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巴西巴伊亚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Bahia）、德国康斯特拉大学（Constructor University）、瑞典马尔默大学（Malmö University）、加拿大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智利天主教大学（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以及德国科隆大学（University of Cologne）。然则，历史反复表明：当非洲高校在相对弱势地位下参与谈判时，往往需付出高昂成本。

外部资助的收益与挑战

外部资助对于非洲高校的科研与创新发展至关重要。斯坦陵布什大学与约翰内斯堡大学借助外部资金建设了生物医学研究院与 4IR 先进实验室；各类奖学金与基金使成千上万名非洲学生得以攻读研究生课程并开展有影响力的研究。与国际机构的合作有助于获取先进技术、全球专长与创新方法，提升非洲研究的国际可见度。众多资助聚焦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与粮食安全等紧迫全球议题，使非洲机构能够在应对这些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但必须看到，尽管外部资助提供了关键资源，也带来可能危及非洲高等教育自主性与可持续性的风险。资助方常将研究主题优先符合自身利益，而非非洲的核心需求。例如，内罗毕大学全球气候适应中心所获相关资助，可能挤占对城市贫困与治理等紧迫地

方议题的关注。资助协议还常在知识产权与决策权上向资助方倾斜，限制科研成果的商业化或公共政策转化。再者，外部经费多为特定项目且周期固定，一旦资助结束，学校便暴露于运营脆弱性之中。约翰内斯堡大学的报告指出，在缺乏稳定经费时，科研设施的运行维护面临困难；斯坦陵布什大学对第三来源收入（占比 32.2%）的依赖亦揭示其科研生态的脆弱。因此，对外部资助的高度依赖，使非洲高校易受全球经济波动与资助方偏好变化的影响。

走向均衡的资助模式

非洲高校应着力建立更为稳健的校内资助机制并加强区域协作，以降低对外部资金的依赖；各国政府应提高教育与科研在 GDP 中的投入占比。高校还应与本地企业建立合作，拓宽经费来源；通过设立捐赠基金并动员校友支持，提升长期财务稳健性。斯坦陵布什大学与约翰内斯堡大学已开始探索上述路径，但仍需在规模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

私立高等教育：模式、差异与区域趋势

丹尼尔·C·莱维

丹尼尔·C·莱维 (Daniel C. Levy)：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教授、“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主任

电子邮箱：dlevy@albany.edu

私立高等教育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并在形式与功能上呈现高度多样化。公共高等教育垄断的最后堡垒已被打破，世界各地形成了“双元体系” (dual-sector systems)。随着阿尔及利亚与希腊近期对私立高等教育的正式承认，古巴成为唯一仍不存在私立高校体系、且高等教育规模本不算小的国家。目前，全球约三分之一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来自私立院校。

《私立高等教育的世界》一书旨在评估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惊人崛起与结构特征，提供一个比较与历史视角下的分析框架，用以理解世界各地私立高等教育的形成与演变。书中指出，虽然私立高等教育已具有普遍性，但其地理分布并不均衡。仅亚洲地区的私立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就已占全球多数，其占比甚至高于该地区在整体高等教育中的份额。

亚洲的私立高等教育生总数的多数 (占比甚至高于其在全球高等教育总入学中的比例)；拉丁美洲虽在人数上居次，却拥有全球最高的私立高等等级教育占比 (略高于 50%)。美国的私立高教如今在规模上已被印度超越，低于全球平均比例，但在学术声望、社会影响、经济和政治重要性上仍居世界首位。

过去数十年，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中，日本与韩国是两个显著例外，两国目前约有 80% 的

大学生就读于私立高校，但这一比例正缓慢下降。然而，西欧地区的情况显示出私立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充满活力并持续带来新的变化：其入学比例从 2000 年的 12% (约 160 万名学生) 增长至如今的近 20% (约 380 万名学生)。

模式特征

私立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增长，其重要意义在于其本质特征——更准确地说，是其多样化的特征。私立高等教育并非一个同质化的现象。研究表明，私立与公立高等教育之间在根本上存在持久而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最明显地体现在资金来源方面，但同样也存在于治理结构、办学使命 (或功能) 等方面。因此，我们可以在学术、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个层面上识别出私立与公办高等教育的差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差异并非在所有情境中都完全相同，因此明确不同类型的差异、以及其在何时何地出现，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一个长期成立的普遍结论是：私立高等教育具有更高层次的“私有性” (privateness)，其活动与利益主要由私人主体主导；相对地，公立高教则体现出更多“公共性” (publicness)。

当然，私立与公立高等教育之间的界限往往并非泾渭分明，这种“模糊化”可能源于

私立高等教育在创立初期与反对方达成的妥协,也可能是在其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探讨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与原因。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加强监管,是造成这种界限模糊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公立高等教育的“部分私有化”则是另一种体现,例如政府与个人共同分担教育成本。与此同时,一个较少受到关注的现象是:某些体制内的变化反而加深了公立与私立之间的差异。例如,菲律宾政府近期在公立大学推行“免学费政策”,使公立教育的公共性进一步强化;而在私立高教领域,营利性院校(for-profit form)的兴起则凸显了私立教育更强的市场导向与私有属性。

私立内部的类型与多样化

《私立高等教育的世界》(*A World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一书不仅比较了(1)私立与公立的差异,也分析了(2)不同类型私立院校之间的差异。这两类比较具有协同作用。在一些国家,如巴西和中国,营利性(for-profit)与非营利性(nonprofit)的私立高校并存,这种并行带来了新的内部结构组合,也产生了新的比较维度。比如,营利性民办教育与公立高等教育之间的差异。总体而言,营利性教育(包括快速发展的在线或远程形式)进一步扩大了私立与公立之间在多个方面的差异,如课程设置、学生与教师的全职与兼职比例、以及教师在学术事务中的权力分布等。

为了分析私立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该书提出了一种分类框架,将私立高教划分为“身份型”(identity)、“精英型”(elite)与“非精英型”(non-elite)三个子领域,并在此基础上细分子类型。宗教类院校历来是“身份型”私立高等教育的主要类型,并在当

代依然占据重要地位,有时还与性别或族群取向相结合。在许多国家,天主教(Catholic)院校往往是宗教型私立教育中最早或最主要的类别;与此同时,新教(Evangelical)与伊斯兰(Islamic)私立院校也在迅速发展。

在美国之外,世界一流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依然极为稀少,私立与公立在学术水平上的“并行体制”几乎不存在,而韩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相较之下,全球范围内更为普遍且快速增长的“精英型”私立高校类型是“准精英型”(semi-elite)——它们在本国教育体系中具有精英地位,但在国际层面尚未达到同等影响力。这类机构通常与商界紧密相连,与高端职业市场、专业领域,甚至政治权力都有所交集。一些历史悠久、学术声誉较高的宗教院校在逐渐淡化宗教使命后,也往往转型为“准精英型”机构。

从招生规模来看,“非精英型”私立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二十世纪后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急剧上升,政府既无力完全承担成本,又无法在社会与政治层面拒绝扩大教育机会,因此在审慎甚至犹豫中,允许了大规模发展“需求吸纳型”(demand-absorbing)私立高等教育。这类院校多为“职业导向型”(product-oriented),与就业市场紧密挂钩。批评者认为其“以培训取代教育”,而支持者则认为其顺应现实、回应社会需求,弥补公立大学的结构僵化。

政策与全球格局

尽管各国存在差异,私立高等教育的扩张呈现出明显的全球性模式。许多地区的发展轨迹相似,一个地区在某一时期出现的现象,往往会在另一个地区、甚至同一区域内的多个国家陆续重现。然而,这种全球化的现实

并非源自任何宏观的全球规划。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是出于某种利益集团或意识形态运动的设计。无论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美国政府，还是任何知识精英，都未曾系统规划或预见这种格局的出现——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专家真正预测到它的发展规模与复杂性。

全球民办高等教育的传播，也并非主要通过各国之间的有意识模仿实现。即便存在某些国际层面的互动与推动者，这些力量也并非以政府为主体。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叶，私立高等教育在拉丁美洲的兴起常常是违背政府意愿的结果。后来，随着大众化教育需求带来的财政压力，其他地区的政府才逐渐以更务实的态度接受私立教育的存在，但它们依然不是主要的设计者。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全球私立教育的现实格局已经形成，对私立教育的观念污名（stigma）在全球意识中显著减弱，这才使得中东和亚洲的一些政府能够更积极地与民办教育领域合作，共同推动其

发展。

总体而言，当今的私立高等教育世界仍主要由私人主体构建，并以其自身的利益逻辑为驱动。它是一个由私人学生及其家庭、大小企业（无论是国内还是跨国）、以及独立的宗教或非营利组织共同支撑的世界。这个体系既包括单一的民办高校，也包括跨国连锁的教育集团。

这一体系在根本上与“政府主导、整体协调、集中规划、系统和谐”的公共政策理念相背离。《私立高等教育的世界》所描绘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fragmented）、主要由私人力量出于自身利益而建构的全球教育现实。这种现实揭示了当代高等教育格局中“私化”的深刻结构性转变。

注：本文基于作者著作《私立高等教育的世界》（*A World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一书，该书于 2024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非洲私立高等教育：根源、趋势和挑战

旺德沃森·塔姆拉特、达姆特乌·特费拉

旺德沃森·塔姆拉特 (Wondwosen Tamrat)：埃塞俄比亚圣玛丽大学 (St. Mary's University) 创始校长

电子邮箱：preswond@smuc.edu.et

达姆特乌·特费拉 (Damtew Teferra)：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高等教育教授

电子邮箱：teferra@bc.edu

非洲私立高等教育领域的兴起与扩张，在其结构、发展路径和质量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模式。非洲私立高等教育拥有既包含悠久传统、又包括新近发展的历史。非洲最早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宗教院校，多为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背景。这些机构在现代世俗教育传入大陆之前，就已提供教育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机构逐渐将教育内容从宗教学科扩展到其他领域，以满足教会体系外人群的需要。20 世纪 60 年代独立后，非洲高等教育体系深受“公益” (public good) 模式影响，公立大学被视为国家象征，是推动国家发展与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在这种背景下，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然而，这一趋势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多重因素推动了这一转变，包括基础教育阶段入学人数急剧增加、公立高等教育部门的招生规模有限且可及性不足、公立大学频繁发生罢工与不稳定、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减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以及世界银行等外部机构的压力等。

分类

目前，非洲私立高等教育总体招生比例约为 18%，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33%)。这表明非洲的高等教育依然主要由公共部门主导。

事实上，在埃及和加纳等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比例正在下降，其原因包括社会对私立教育的负面认知、较高的学费、来自邻国的国际学生数量下降、教育质量问题、通货膨胀，以及来自公立院校日益激烈的竞争等。

非洲大陆存在多种类型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其中一类重要机构是宗教办学机构，它们在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具有显著影响力。虽然这些机构通常以非营利形式运作，但随着教育成本的上升，这一区分变得越来越模糊，有些宗教院校的费用甚至与营利性大学持平或更高。

非洲也存在精英型私立大学，但规模有限。例如，埃及、肯尼亚和南非的一些半精英大学 (semi-elite universities) 提供高质量项目，聘用优秀师资，拥有雄厚资源，并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和持续性评估。

最普遍、也最具“需求吸纳”功能的机构是营利性私立院校，其所有者包括个人、家族企业、公司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与当地高校

合作的外国机构。家族拥有型私立大学近年来在非洲多个地区呈增长趋势。

大多数私立院校侧重于提供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类学科，其中以商科、管理、教育和神学最受欢迎，而 STEM、职业教育和农业类学科相对较少。尽管一些国家允许私立院校开设全学科项目，但也有国家，如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加纳，仅允许私立大学提供学士及硕士层级课程。

在一些国家，私立院校还因其法定称谓而有所不同。例如，在肯尼亚，私立院校可以使用“大学”称号；而在南非，由于研究活动有限，它们被称为“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s）。与全球趋势一致，非洲的私立院校很少参与科研，其研究产出较为有限。

针对私立高等教育的公共政策

非洲各国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与运营在法律规定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主要由单一机构负责认证和外部质量保障；而在埃及等国家，这些职责则由多个机构以协调方式共同承担。

在埃塞俄比亚，认证程序对私立院校执行严格标准，但占主导地位的公立部门却不受同等要求，导致体系内存在“双重标准”。加纳对新设立的私立院校设有独特的规定：这些机构必须先与一家经授权的公立院校建立附属关系，随后才有可能获得自身的总统特许状。

非洲大陆大多数私立院校很少获得政府资助或补贴。在很多情况下，学费和院校自筹收入构成私立大学的主要财政来源。在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等国，私立院校的学生无资格获得政府资助。然而，也存在例外，例如肯尼亚，政府提供给公立院校学生的贷款计划同

样向私立院校学生开放。

挑战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升学途径，为非洲高等教育体系作出了宝贵贡献，也支撑了非洲大陆的发展目标。它们在拓宽学生的教育获取途径、选择空间和发展机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提供与学生未来规划相匹配的多元学习选择。

然而，私立高等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入学机会。私立高等教育还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更加多样化的课程设置，促进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的竞争，并创造就业与收入来源。由于其独特优势，如更严格的学生学习进度监控机制、免受公立院校频繁罢工影响、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更高质量的互动，一些私立院校甚至比公立院校更受青睐。

公立院校通常以行政僵化和官僚程序繁琐而闻名，而成功的私立院校往往具有更强的活力、高效性和灵活性。为了实现社会与经济效益，它们通常减少资源浪费、加强战略定位、注重就业导向的培训与就业服务，并确保更高的内部责任机制。一个充满活力的私立部门还可促进部门间竞争与合作，从而推动公立体系变得更加高效、更加能回应社会需求。

尽管如此，非洲的私立院校在规模、范围和增长方面仍受到诸多瓶颈制约。这些挑战包括：缺乏全面的国家政策、经费有限、无法获得政府支持、社会负面认知、入学率低、难以吸引物质和人力资源等。内部管理问题，如治理结构薄弱、管理体系不健全、以及个人所有者之间的角色冲突，也常常妨碍高质量教学与学习的有效开展。

此外，私立院校还受到严格监管、不断变

化的政策要求、不确定的程序、认证过程的延迟、以及公私立院校认证标准不一致等问题的影响,加之监管执行能力有限。这些挑战在非洲私立高等教育领域相当普遍,并为该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显著障碍。

未来发展路径

要推动非洲私立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必须正视并解决各国政府和相关利益方所提出的各种挑战与关切。对于私立院校而言,树立积极形象和增强社会对该领域的信心至关

重要。为此,它们需要强调自身在提供多样化和富有竞争力的课程方面的价值,而不仅仅依赖于通常被赋予的准市场化态度与做法。

此外,构建有关非洲私立高等教育现状的稳固知识体系同样十分重要。深入理解这一领域,有助于推动更为科学的政策制定、规划与决策。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建立在知识积累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而非依靠个人偏好、随意性或单纯的商业驱动。

哈萨克斯坦私立高等教育：30 年的发展与监管

阿米娜·沙尔达别科娃

阿米娜·沙尔达别科娃 (Amina Shaldarbekova)：哈萨克斯坦古米廖夫欧亚国立大学 (L.N. Gumilyov Euras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国际关系系高级讲师
电子邮箱：a.shaldarbekova@gmail.com

在哈萨克斯坦，私立高等教育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已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许多后苏联国家一样，私立高教部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开始出现。事实上，到 2023 年，该行业已经发展了 30 年，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它呈现出独特的情况。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在所有后苏联地区都可以看到私营机构的快速增长，但目前，哈萨克斯坦仍然是唯一一个拥有强大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国家。在哈萨克斯坦，无论是在机构数量还是入学人数方面，非公立部门都处于领先地位。在其他后苏联国家，除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外，公立机构的数量超过私立机构，私立高校的在校生比例也未超过该地区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的 40% (截至 2023 年)。因此，哈萨克斯坦成为该地区唯一一个由私立高校作为主要高等教育提供者的国家。本文旨在揭示哈萨克斯坦私人高等教育扩张的过程，并对其成因进行初步解释。

背景

在哈萨克斯坦，私立高等教育首先由 1993 年的《高等教育法》予以合法化。不久之后，第一批非公立高校随即出现。与大多数前苏联国家类似，最初几乎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 (甚至完全缺乏)。因此，薄弱的法律基础、1990 年代新的社会经济现实 (尤其是经

济衰退)，再加上先前高等教育体系的垄断结构，共同为私立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提供了肥沃土壤。结果，到 1997 年，哈萨克斯坦已经拥有 71 所私立高校，而公立大学为 62 所，且数量仍在持续增长。与此同时，私立高校的学生入学人数也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

进入 2000 年代中期，私立部门在绝对数量上达到顶峰，在高校数量和学生规模上均超过公立部门。值得一提的是，哈萨克斯坦的私立高校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并无不同：规模较小、学术水平较低、资源匮乏、学费低廉，以及缺乏稳定的专职教学人员。这种“可疑的”增长很快引发担忧，并随之迎来下滑期，而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监管的延迟 (这一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可观察到)。到 2000 年代末，许多私立高校停止运作，被关闭或与其他机构合并。政府监管也开始收紧，新增高校的设立条件被大幅提高。然而，即便如此，私立部门依然保持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 年，在全国 112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59.8% 为私立高校，吸纳了全国 59.27 万名学生中的 54.2%。分析显示，在哈萨克斯坦的案例中，国家和市场两方面力量共同推动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

国家的角色

在哈萨克斯坦，私立高等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始终处于持续推进的高等教育改革之中。

自其出现以来,该部门一直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背景下演变,而国家体系建设重点仍在公立部门,同时也受到国家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公立高等教育经历了多个转型阶段:从引入新自由主义改革到加入博洛尼亚进程。私立部门必须不断适应这一变化的环境。不可否认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改革举措中有一些确实意在限制私立部门的快速增长。然而,国家在使私立高等教育合法化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 2000 年代初期,政府为公立和私立机构建立了统一的法律与监管框架。私立高校因此需要接受许可、考核与认证等程序。一方面,这使政府能够对私立部门进行监管;另一方面,这种规范也使非公立院校受益,因为它确保了这些机构能够维持一定水平的教育质量。因此,尽管私立教育面临广泛批评,但由于国家监管体系的建立,大量私立院校得以持续运作。

另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是国家对私立高校颁发学位资格的认可。根据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哈萨克斯坦的教育与科学部向所有高校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通常称为“文凭”)。根据 1999 年的《教育法》,私立高校也被赋予颁发统一国家文凭的权力,并一直延续至 2021 年。在历史上由国家垄断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私立高校能够与公立大学一样颁发学位,无疑吸引了大量学生。从这一意义上说,私立部门的扩张与其学位授予权之间存在明确联系。某种程度上,授予学位的权力本身就成为私立部门发展的起点和推动因素。

此外,私立高校的增长也可以从部分公立大学的私有化得到解释。2000 年,政府提出将部分公立高校进行全部或部分私有化。此后多年间,其中两所高校完全私有化,另外八所被改组为股份公司,国家持有约 20% -

35% 的股份,其余股份由私人投资者拥有。到 2021 年,这些股份也被出售给私人主体,这些高校最终全部完成私有化。公立院校的私有化也推动了私立大学数量及其招生规模的进一步增加。

市场的角色

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市场需求的推动。尽管在与公立部门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但其快速扩张(至少在数量上)表明私立高校在教育市场中拥有强劲的支持。虽然社会上对其教育质量和稳定性存在担忧,且其长期运营缺乏保障,但私立高等教育依然具有吸引力,因为私立高校以较低的入学门槛和较低的学费提供高等教育资格。最初,学生数量的增加与教育机会的扩大有关,尤其是为此前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提供了更多机会。学习模式也是吸引学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 2000 年代,私立高校中多达 50% 的学生注册于非全日制项目。此外,自成立以来,私立院校一直提供并继续提供市场导向的热门专业。值得注意的是,公立大学中有很大部分学生属于自费入学,而收费通常比大多数私立高校高得多。因此,私立高等教育成为许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能够负担得起的可替代选择。随着教育机会的增加,市场也推动了私立高校之间的差异化:一些私立院校能够满足那些愿意支付更高学费的学生群体的需求。

当前态势与未来展望

过去几十年间,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在规模和类型上都实现了显著增长与多样化。然而,大多数私立院校仍处于高等教育体系层级结构的较低位置。只有一小部分私立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相对稳固的地位,并在

全国范围内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此外，社会对于私立部门的争议性观点并未消失；相反，随着时间推移，包括公众在内的各类利益相关者开始逐渐意识到私立院校之间的差异性。总体而言，目前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表明，哈萨克斯坦的私立高校在机构数量和学生规模方面仍将维持较高占比。然而，私立高校的数量不太可能再次出现类似 21 世纪那

样的大幅增长。相反，正如近年来的趋势所显示，具有“需求吸收型”（demand-absorbing）特征的部分院校可能会逐步退出市场，导致该部门在数量上有所收缩。与此同时，那些能够保持竞争力并继续运营的私立院校可能会扩大规模，并持续服务于不同需求群体，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压力之下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和人口下降

卡西迪·龚

卡西迪·龚 (Cassidy Gong)：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安大略教育学院
讲师

电子邮箱：cassidy.gong@mail.utoronto.ca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其私立高等教育部规模位居全球第三，目前有 700 多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共招收超过 500 万名学生。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60.2%，中国高等教育在短短 20 年间从精英化阶段跨入普及化阶段。在体系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政府鼓励私立高等教育发挥“需求吸收” (demand-absorbing) 作用，为高考成绩处于最低分段的学生提供进一步教育机会。如今，私立高等教育招收了全国四分之一的高等教育学生，但仍普遍被视为质量偏低，其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歧视现象。关于私立高校的公共政策，尤其是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办学登记制度的区分，变得愈发不稳定。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以及人口减少的背景下，中国私立高校正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质量提升的挑战

大多数私立高校在提升质量方面陷入恶性循环，其根源在于学费依赖、学生高考成绩偏低，以及难以吸引和留住高质量教师队伍。由于私立高校往往高度依赖学费作为唯一收入来源，其专业设置只能集中在成本较低的应用型专业，如商科、外语和信息技术。因此，私立高校的学费平均是公立高校的三倍。学生投入较高，但其毕业后的就业回报却明显偏低。据估计，公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比私

立高校高 50%。公立高校学生的高考平均分比私立高校学生高 51 分，这反映了进入高等教育时两类学生在能力水平上的显著差距。然而，尽管私立教育质量不高，家庭仍愿意支付高额费用，这被归因于儒家文化社会中对教育成就的高度重视，这是一种社会荣誉密码。

私立高校在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方面的困难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与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私立高校普遍依赖从公立大学退休的教师担任高级行政人员与讲师。这种做法让私立高校受益于其经验和专业性，但过度依赖退休教师也带来了问题：缺乏创新能力、无法及时掌握最新课程和教学法。此外，这种做法还造成私立与公立高校课程设置上的同质化，与私立高校试图打造独特定位的目标相矛盾。年轻学者更倾向于进入公立高校工作，即便薪酬较低；那些最初在私立高校开始职业生涯的教师，一旦公立高校出现职位机会，也会迅速跳槽。公立高校在中国普遍被视为拥有更高的工作稳定性、更多福利、更高。

多变的政策环境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约 30% 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为家族所有，另有约 30% 由私人企业拥有（其余 40% 由慈善组织创办或由国有企业、公立大学持有）。尽管法律身份为非营利机构，但估计有 80% 的私立高校在创办时

便意在获取并分配利润。在家族与企业所有的高校中，许多机构已由两代人持续投入资源进行创办与发展。由于政策的不明确以及围绕盈利问题的混乱，政府在 2010 年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所有私立高校必须在 2021 年前选择注册为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机构。自此，只有 24 所高校（约占全部高校的 3%）正式注册为营利性私立高校，约占私立高校学生人数的 4%。这些新注册为营利性的高校通常属于教育集团，或其结构中涉及国有企业。营利性高校数量增长如此缓慢令人意外，因为原本约有一半的私立高校明确表达过希望转为营利性。尽管存在诸多顾虑，例如需按企业法重新评估土地价值、固定资产，并承担相应税收，许多高校仍希望其土地权属能获得法律保障，并希望其资本资产能按企业法进行管理。根据 2020 年《民法典》，营利性法人可以分配利润，并在机构关闭时享有资产继承权（这些权利非营利组织不具备）。相比之下，选择非营利身份意味着回到一种在中国缺乏清晰制度与政策经验的体制形式。

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只是“选择”问题。绝大多数表达出希望注册为营利性的高校，其申请均遭拒绝。更复杂的是，拒绝申请的往往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这些部门通常的理由是，尽管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在形式上提供了注册为营利性的选项，但缺乏任何具体操作细则，这可能意味着中央政府实际上并

不真正支持营利性私立教育的发展。

在政府对非营利与营利性机构模糊不清的区分引发动荡之后，私立教育领域再次面临重大变革：数百所公立大学下属的民办二级学院必须选择独立办学、并入公立机构，或被关闭。那些选择独立的学院需满足严格条件并承担高额成本，且不得注册为营利性机构，这很可能与其成立早期复杂的公私合作结构及资源共享安排有关。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关于私立高校的政策使得大多数机构仍在探索如何在未注册为营利性的情况下实现盈利与利润分配。事实上，非营利与营利的界限愈发模糊：一些省份甚至决定向非营利私立高校的学费与住宿费征收 25% 的企业所得税。

结语

在质量提升困境与高度不稳定的政策环境之间艰难求生的同时，私立高等教育正面临另一项生存威胁，即 1979 年至 2013 年中国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人口下降。如今，北京和上海已有多所私立中小学陆续关闭。2024 年，许多私立高校首次出现无法完成政府下达的招生计划、学生数量不足的情况。再加上经济放缓，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的整体经济压力，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前景愈发不明朗。

巴西私立高等教育：公平与远程教育

弗拉维奥·卡瓦哈斯、西蒙·施瓦茨曼

弗拉维奥·卡瓦哈斯 (Flavio Carvalhaes)：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社会学系副教授

电子邮箱：flavio.carvalhaes@ifcs.ufirj.br

西蒙·施瓦茨曼 (Simon Schwartzman)：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 (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科技政策系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simon@schwartzman.org.br

巴西的高等教育体系由私立机构主导，约占全国总入学人数的 80%。慈善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缩减至少数宗教或社区背景的院校，而营利性部门则由一小部分大型教学集团主导，这些集团的股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 2023 年，十家公司共承担了全国约 37% 的学生入学人数，主要提供低成本的远程教育课程。关于面授和远程教育的总入学与新生入学数据显示，二者分别占 42% 和 58%，说明远程教育的普及程度正持续上升。

历史背景与拉丁美洲比较

巴西的私立高等教育并非近几十年的产物，其发展可追溯至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的立法规定，高等教育应由精选的大学提供，并由全职、以研究为导向的学者任教。只有联邦政府和少数富裕州（如圣保罗州）能够达到这些标准。随着巴西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由于成本过高且制度限制较多，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入学需求，这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扩张打开了空间。这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不同，后者的公立大学通常对完成中等教育的学生较为开放，而大规模的私立扩张通常是在此之后才出现。

卢拉与博索纳罗执政时期

在 1990 年代卡多佐 (Cardoso) 总统执政期间，巴西政府决定允许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以营利性形式运营，由此形成了一个市场，使资金更雄厚、效率更高的机构能够收购规模较小的学校。历史上，劳工党在卢拉 (Lula) 与罗塞夫 (Rousseff) (2003 - 2018) 时期对公立大学大力支持，对私立部门则抱持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然而，卢拉政府的优先目标之一是扩大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而这在私立部门中更易实现。为此，政府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一个是“全民大学计划” (ProUni)：该计划给予私立高校税收减免，以换取其提供学生奖学金；另一个为宽松的学生贷款计划 (FIES)：在 2014 年推行高峰期，该贷款支付了约 40% 私立高教新生的学费。政府也努力新建联邦大学并扩大现有大学的招生规模，但其影响相较私立部门仍然有限。

为解决公立部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2012 年通过的新法律要求联邦大学将 50% 的招生名额保留给平权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 学生。在政策实施早期，非白人 (“pretos” 和 “pardos”) 学生比例从 22% 上升到 50%，其中超过 60% 的学生来自公立学校（通常被

视为低收入群体的代表)。

自 2015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联邦预算,使旨在扩大公共资源的相关政策受到限制。学生贷款计划大幅削减,促使私立部门将投资方向转向远程教育。同时,原计划用于继续扩建联邦大学的资金也未能落实。

2022 年,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右翼自由主义纲领支持下当选总统。他的竞选重点包括批评公共部门腐败、倡导自由市场以及推行保守价值观。他和其支持者认为科学界和公立大学受到左翼思想影响。在疫情期间,他的政府采取了反科学立场,抵制疫苗推广,反对州政府实施的社交隔离措施。公立大学面临预算削减,影响了薪资发放及日常运营。

卢拉于 2023 年再度上任后,将工作重点放在其此前执政时的几大核心议题上:资金支持、扩张、机会公平与监管,并同时关注研究生教育与科研发展等问题。

融资与大学自治

联邦大学占全国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的 13%。全国 121 所联邦大学的年度成本约为 90 亿美元,教育部的总预算约为 240 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资金(80%至 90%)用于支付高校学术及行政人员的薪资和退休福利,这些人员享有工作稳定性。日常运维支出仅占 10%至 15%,使得用于投资发展的资金非常有限。新政府成功确保了薪资与日常维护的拨款,但未能落实投资资金或加薪政策,导致 2023 年大多数校园内的大学教职员工进行长期罢工。

尽管巴西法律赋予大学自治权,但公立大学在资源获取与管理方面仍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尽管有人提出应增强大学的自主性和结果责任制,但这些改革遭到学界的抵制,

因为他们担心此举可能导致大学逐渐私有化。

按国际标准比较,巴西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仍然偏低,近年的增长主要来自私立远程教育。然而,在 2024 年,政府决定不再批准新的远程教育项目。此措施的长期成效尚不明确,政府也面临来自法律与政治层面的压力,需要制定明确的标准来规范此类教育服务的运行。

新兴精英私立机构

联邦大学面临的财政困境以及其学生群体社会构成的变化,为一批新的精英私立机构的出现打开了空间。这类机构特别集中在工商管理、经济学、工程学和医学等领域,其中一些为慈善性质,依靠企业界的支持,同时实行高额学费与为优秀申请者提供奖学金相结合的模式。巴西在这一方面的发展较为滞后,但最终与许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趋同——私立部门主要服务社会精英,而公立部门则更多面向社会中较大规模且经济条件较弱的群体。

研究生教育与科研

巴西在高等教育研究生培养方面在本地区内独树一帜,这主要集中在公立大学体系内。2013 年,巴西约有 40 万名硕士与博士生就读于近 5000 个项目,这些项目均免学费,并为许多学生提供奖学金。这些项目也是全国重要的科研中心。

此外,约有 150 万名学生就读于私立机构开设的非监管类研究生课程,这些课程主要侧重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如工商管理硕士(MBA)。

结语

巴西高度私有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凸显了

市场激励、政府监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复杂互动。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政府正面临提升远程教育质量、维持公平政策,以及平衡公私部门角色等多重挑战。联邦政府和其他利益

相关者能否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确保建立一个服务学生与社会需求的良好监管体系,目前仍未可知。

德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与发展

伊萨克·弗鲁明、亚历山大·卡尔金

伊萨克·弗鲁明 (Isak Frumin)：德国康斯特大学 (Constructor University) 教授、高等教育
创新观察站 (Observa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s) 负责人

电子邮箱：ifrumin@constructor.university

亚历山大·卡尔金 (Alexander Kalgin)：康斯特大学高级分析师

电子邮箱：akalgin@constructor.university

在《国际高等教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第 109 期中,凯姆(Barbara Kehm)曾这样描述 2022 年德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市场：“多数私立院校规模过小、专业过窄、质量平平,难以引起公众关注。因此,该领域对公立体系并未构成竞争或威胁”。尽管我们认为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并未与公立高等教育体系形成直接竞争关系,但可以观察到,高等教育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私立高等教育持续增长,并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毕业生数量不断减少的背景下,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在一个以公共教育为主的体系中呢?下面我们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

欧洲人口是世界上最老龄化的地区之一,而且老龄化趋势仍在加速。这一现象在德国同样明显。德国当前的年轻人口数量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自 1950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15 至 24 岁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未像现在这样低。相比之下:1984 年,年轻人在西德人口中占 16.7%;到了 2023 年,在统一的德国,这一比例降至 10%。

人们可能会预期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会受到影响。然而,高校入学人数直到最近才出现

下降趋势(总入学人数在 2020 年达到 294 万的峰值,2024 年小幅下降至 287 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下降主要发生在公立高校。2019 年至 2024 年间,公立高校入学人数从 259 万降至 246 万,而私立高校的入学人数则从 24.6 万上升至 37.2 万。2004 年,德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学生仅为 3.9 万,但之后持续增长。如今,德国 13%的高等教育学生就读于私立高校(2015 年为 8.5%)。值得强调的是,尽管面临不利的人口趋势,私立高等教育仍实现了增长。因此,私立高等教育不仅扩大了自身份额,还推动了整体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部分私立高校正发展成为“巨型大学”:德国规模最大的应用科技大学如今是一所私立机构,即国际应用科技大学(IU Hochschule,学生超过 13 万),其次是另一所私立埃森经济管理应用技术大学(FOM Hochschule,学生超过 5 万)。根据德国高校官方信息平台(Hochschulkompass.de)的信息,截止 2024 年,全国共有 275 所公立高校和 110 所私立高校。

德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历史相对较短。在 1983 年第一所正式认可的私立大学维滕/黑尔德克大学(Witten/Herdecke University)成立之前,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长期由公立机

构主导。要理解这一发展背景,需要认识到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由三大类院校构成,它们因教育重点和培养方式不同而加以区分:传统大学(Universitäten)、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n)以及艺术与音乐学院(Kunst- und Musikhochschulen)。传统大学有时也被称为“研究型大学”或“综合性大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公立应用科技大学在德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许多学院已开始提供研究生项目。私立应用科技大学的发展趋势亦然。如今,大多数德国私立高校实际上都是应用科技大学(根据德国高校官方信息平台数据,目前有 83 所私立应用科技大学以及 21 所私立大学)。

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在经济、法律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占比非常高(私立院校 69%,公立院校 34%);而在自然科学(13%对 41%)和人文学科(0.7%对 13%)中占比显著偏低。德国的研究型精英私立院校规模非常小,仅包括三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以及少量专业化院校。即便是私立的“综合性大学”,除极少数例外,也无法在科研(论文产出与科研经费)方面与公立综合性大学竞争。大多数私立院校可归类为主要“职业导向型”。

大多数私立大学以非营利机构形式运营。但与此同时,营利性私立高校及其学生的重要性正在上升(例如拥有超过 13 万学生的国际应用科技大学就是一所营利性院校)。在德国社会普遍坚信高等教育应免费提供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尤为引人注目。

新进入者

那么,哪些学生就读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呢?其中一个答案是国际学生。德国的大多数英语授课本科项目由私立高校开设(相比之下,私立高校提供 31 个全英文授课项目,

而公立高校仅提供 25 个)。

然而,相当大比例的学生来自德国本土人口。这意味着新的学生群体正在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其中一类是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父母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个不断扩大的群体在适应大学生活方面面临独特挑战,因为与进入德国传统公立高校的学生相比,他们通常在学术准备方面相对不足。随着潜在学生规模因人口变化而缩小,而高等教育因持续大众化而不断扩张(根据 OECD 数据,25 - 64 岁人群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从 2017 年的 28.6%增长至 2023 年的 33.3%),大学为了维持招生规模,正越来越多地从学术准备程度较低的群体中招收学生。

以数字化提升效率

随着越来越多学术准备不足、在适应大学生活方面面临各种挑战的学生进入高校,私立大学正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教育学生的“边际成本”不断上升,推高了高校的运营成本,也可能危及高等教育的质量。

应对这一挑战的主要手段是在线教学与数字化。私立高校在开设线上课程方面明显更加积极,并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质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目前,私立高校共提供 770 个在线课程项目,而公立高校仅提供 288 个。在全部在线课程中,有 56 个以英语授课,1001 个以德语授课。在公立部门中,大学提供 105 个在线项目,应用科学大学提供 179 个。而在私立部门中,几乎所有在线课程项目(770 个中的 767 个)都由应用科学大学提供。

对高校网站和新闻报道的分析同样表明,大多数私立高校都希望借助新技术(在线学习、数字资源、人工智能等)降低教学成本,并利用规模效应。

德国最大的应用科学大学国际应用科技大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学生人数从 2012 年的 300 人迅速增长至 2024 年的 13 万多人，这与其积极采用人工智能与在线学习密切相关。国际应用科技大学甚至声称，其人工智能教学助理 Syntea 能提供个性化互动，让学生

随时就学习问题提问并获得即时反馈。

总而言之，在德国，私立高等教育不仅吸收了因教育大众化而产生的新增需求，还通过积极运用远程教育和人工智能，以降低平均教育成本的方式，为学生创造了新的机会。

风向转变：印度和中国学生的流动趋势

利亚·梅森、米尔卡·马特尔

利亚·梅森 (Leah Mason)：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负责研究、评估和学习副主任

电子邮箱：lmason@iie.org

米尔卡·马特尔 (Mirka Martel)：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研究、评估和学习部门负责人

电子邮箱：mmartel@iie.org

在新冠疫情之后，国际学生的流动速度再次加快，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预测，到 2030 年底，全球国际学生的流动将达到 1000 万。最大的生源国是中国和印度，占全球国际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相关预测也持续表明，这两个国家将在未来的学术交流中继续位居前列。

我们能从过去汲取哪些经验，以帮助预测未来的趋势？自 2001 年以来，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Atlas 项目”与全球 30 多个合作伙伴共同收集可比的国际学生流动数据，描绘了学生流动的格局。在此期间，中国一直是国际学生的最大生源国。

到了 2024 年，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学生输出国。鉴于印度学生攻读研究生人数的前所未有增长，以及新冠疫情对中国学生海外流动的影响，这一趋势早已可预期，但它也意味着国际学生流动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需要特别关注的一点是：中国和印度学生的背景特征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些差异会影响他们的留学国家选择、专业兴趣等多方面。通过研究这两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入学趋势，相关利益方将能够更好地为未来十年国际学生的需求和特征做好准备。

中国学生海外就读趋势

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连续数年呈下降趋势，并受到新冠疫情的显著影响。在 2020 年的高峰期，“Atlas 项目”的 11 个合作伙伴报告称，近 100 万名中国学生在其国家就读。而到了 2024 年，16 个合作伙伴报告这一数字下降至不足 84.7 万人。主要留学目的地的下降尤为明显，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

其中三分之一 (277,398 名) 在美国学习。这比前一年下降了 4%，并比 2020 年减少了约 10 万人。英国和澳大利亚分别以 154,260 名和 142,420 名学生位列第二和第三大目的地。

在美国，中国学生增速放缓其实早在疫情前就已出现，且疫情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速。2010 年代赴美中国学生的大幅增长主要来自本科生群体，而近年来的下降也主要出现在这一群体。尽管中国研究生人数有所回升，但本科生人数仍在持续下降。

鉴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自身的容量不断扩大，能够接纳更多国内外学生，同时考虑到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整体减少的趋势，未来中国本科生赴海外留学的人数可能难以回到过去的高点。至于研究生人数是否会继续增长，以及二者综合能否再次推动中国海外

学生总量回升，还有待观察。

印度学生海外就读趋势

印度学生赴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长，主要由三个主要留学目的地推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作为印度学生的首选目的地，加拿大在 2024 年接收了 384,965 名印度学生，比前一年增长 33%，较 2020 年则增长了 94%。同样，美国在高等教育阶段接收了 332,217 名印度学生，比上一年增长 24%；英国则接收了 173,190 名学生，增长率高达 42%。超过一百万名出国留学的印度学生中，有 86% 选择了这三个国家之一。

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输出国，源于 2020 到 2024 年之间海外留学人数的迅速攀升，在极短时间内几乎翻倍。印度学生涵盖所有教育层级，其中略低于一半为本科生，略高于一半为研究生。

与中国学生相比，印度学生在各目的地的就读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美国和英国，超过 80% 的印度学生就读于研究生阶段，而在加拿大，90% 以上的印度学生就读本科。

随着印度高等教育人口不断增长，其境外留学生规模仍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然而，印度学生的留学偏好因人群而异。大多数选择本科阶段出国的印度学生前往加拿大，原因包括：职业技术类教育项目被纳入国际学生的本科学费体系，使其更易获得且更具经济性。同时，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及就业路径也进一步提升了其吸引力。

另一方面，前往英国或美国攻读研究生的印度学生多数已在印度完成本科教育，随后再赴海外深造。这表明：选择加拿大的学生

群体与计划前往英国或美国的学生群体在背景和 demand 上存在明显差异。

对未来中印学生流动的影响

尽管新冠疫情影响了所有国家，但各国对疫情的应对方式以及恢复国际学生流动的进程却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许多回国的学生如今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任职，推动着中国大学的扩张与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全球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使得中国家庭重新思考出国留学的必要性。然而，中国从疫情中恢复较为缓慢，加之国内经济下行，使得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拥有高等学位者，就业压力持续增大。这促使许多中国学生重新评估攻读高等学位的价值，以及是否需要出国留学或在海外寻找工作机会。

印度方面，年轻人口持续增长、高等教育承载能力有限，以及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是大量印度学生选择出国深造的主要驱动力。随着加拿大等国对国际学生施加更多限制，一个关键问题随之出现：原本考虑赴加拿大攻读本科的印度学生，是否会将目光转向英国或美国？若出现这种转向，这两个留学目的地可能因此受益，但现有数据也显示，这部分学生的背景特征可能与传统赴英美的印度学生不同。与此同时，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和印度学生是否会越来越多地将亚洲区域内的国家视为替代性留学目的地。

中国与印度学生流动趋势的演变，再次强调了高等教育机构在制定招生与拓展策略时，应同时关注这两个关键生源国，并提供能够满足其不断变化的学生特征与需求的学术项目。

是时候再谈谈签证欺诈问题了

艾伦·古德曼

艾伦·古德曼 (Allan E. Goodman)：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首席执行官

电子邮箱: agoodman@iie.org

去年，美国名校的一名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题为《我把自己的事业与人生建立在谎言之上》 (*I have built my career and life on lies*) 的文章。他在文中详细描述了一套“高度结构化的造假计划”，包括利用伪造文件以及家乡政府官员的签名印章，从而获得大学录取与奖学金。文章发布在 Reddit 后不久，他即被逮捕、开除并随后被遣返。除了“千万别把这种事发在社交媒体上”这一显而易见的教训之外，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启示？

签证造假并不是新问题

在过去十年间，美国已经有多起涉及 H1B 工作签证系统欺诈与滥用的联邦案件达成和解，北美和外国公司因此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赔偿与罚款；也有案件涉及利用学生签证进行人口贩运。高等教育媒体也不断报道“幽灵学生”现象——一些国际学生从未到校报到，或仅仅短暂出现后就立即转学到另一所课程要求极低、却能轻易找到工作的学校。当招生官追踪这些缺席模式时，有些人得出结论：某些地区的国际申请中，可能存在相当比例的造假。

签证造假从来都不是新现象或新挑战。早在 1921 年，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就与美国移民局局长达成协议，每年对来美学习的国际学生进行统计——当时美国甚至还没有非移民签证类

别。作为允许外国学生与学者在国家配额与候补名单下仍能离开埃利斯岛的交换条件，美国国际教育协会被美国领事系统雇佣，协助美国外交官阅读外国成绩单与申请材料。这段合作关系的建立，是因为领事官员发现越来越多来自他们不熟悉的学校的申请，而他们很难判断申请材料与成绩单的真实性。

与今天相似，当时也存在专门的职业造假者，他们收费帮助任何想借读书名义赴美工作的人。在某些国家，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曾收到过质量极高、附带貌似真实的录取信的申请，而这些材料实际上是街头小贩或“持牌代理”伪造的。在签证面试时，当被问到为何选择申请材料中列出的专业时，这些学生往往无法回答，因为他们从未读过以他们名义提交的材料。

我们正走向一场完美风暴吗？

签证欺诈如今变得更加复杂且高度组织化。一些潜在申请者的父母被犯罪分子盯上，这些人伪装成不同部门的政府官员，主动联系家长，声称他们“得知”学生即将申请出国，要求家长订购某种“特殊服务”，以便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和处理。

在某些地方，签证面谈的预约被“黄牛”全部抢走，再以高价转卖给学生；否则学生会发现自己预约到的面谈时间已远远晚于开学。高利贷机构与文凭工厂狼狈为奸，一旦学生

陷入债务，他们便威胁曝光学生的假学历以逼迫其继续借贷。

如今，美国近 70% 的高校使用国际招生代理。然而，一些代理并不诚信。据估计，在某些国家，由代理提交的申请者中，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学生要么根本不来报到，要么带着伪造的学术记录和成绩入学。

所有这些骗局和造假行为都因人工智能（AI）的加持而变得更为强大，而 AI 的发展速度已远远超过招生官识别其使用的能力。这使得遵规守信、诚实申请的学生反而受到伤害。

美国国务院官网上有一个关于护照与签证欺诈的页面，开篇即指出，“护照与签证犯罪”自 1916 年以来一直是问题。其列出的“常见欺诈类型”包括“提交虚假材料申请签证”和“歪曲自己申请签证的理由”。

在国务院每年公布的签证拒签总数中，并未单独列出涉嫌欺诈的数量。然而，当被问及相关比例时，领事官员最常见的回答是：“至少一半。”

高等教育必须积极应对

随着美国驻外使领馆将学生签证预约列为优先事项，并签发创纪录数量的学生签证，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主动参与对抗欺诈的行动。经验丰富、资源充足的院校应携手合作，与经

验较少的机构共享防范欺诈的最佳做法。高校应持续向学生和家长宣传如何识别不良代理、如何应对申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坚持所有申请材料必须由申请者本人独立完成。同时，高校也应利用社交媒体讲述那些诚实申请、成功录取并顺利获得签证的国际学生故事。

随着主要的国际教育、咨询、招生管理和录取相关组织继续合作吸引国际学生，就更有必要共同领导一场统一的行动来应对签证欺诈。第一步就是充分认识威胁的规模、特征和严重性——应由这些组织成立一个工作组开展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可以开始总结“ChatGPT 时代”所积累的经验，探讨如何有效打击这种本不应出现在入学申请或签证面谈环节中的行为。

签证欺诈并非美国独有的问题。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也面临类似情况，它们同样使用招生代理，并经常遇到类似的不道德行为。共享经验、共同应对签证欺诈并制定统一的伦理标准，是非常重要的。

国际教育协会拥有一个全球网络，成员包括参与国际学生流动和招生录取的各类组织。国际教育协会将与美国国内以及全球的相关组织合作，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以保障数百万渴望出国留学的学生的利益。

撤销国际化的危险

汉斯·德·维特

汉斯·德·维特 (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
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荣誉教授

电子邮箱：dewitj@bc.edu

观察当前高收入国家围绕高等教育及其国际化展开的辩论——包括讨论限制国际学生招生规模、加强对知识安全的关注、以及对与特定国家合作的学者和机构的攻击——人们不禁要问：高等教育国际化 50 年来的进程是否已走向终结？我们是否正在“撤销”国际化？

这一问题成为 2024 年 11 月 27 日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与布里斯托大学 (University of Bristol) 高等教育转型中心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s) 联合举办的一场网络研讨会的主题。会议从多个角度讨论了这一议题：民族主义与反国际主义、国家安全、市场化与竞争以及社会责任。在过去 50 年里，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当前复杂的全球环境中，回顾国际化的演进历程并展望其未来可能的衰退与转型，显得尤为重要。

从乐观主义走向新自由主义

20 世纪 80 年代末，高等教育国际化从一系列边缘化、零散、临时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高收入国家高等教育战略中更为系统、整体的一部分。

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乐观的时期，合作、交流与团结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在澳大利亚

和英国等部分英语国家，市场化和竞争已初露端倪。随着铁幕的倒下、欧洲教育和研究计划的推进，以及全球化过程中对知识生产与合作的需求不断增长，高校得以更多地参与国际化建设。

然而，进入 21 世纪前后，国际化的主导逻辑开始转向更加竞争性与市场导向的模式。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北方推动国际化的主要动力，中低收入国家，即全球南方国家，也成为主要对象。

尽管反作用的力量也存在，例如欧洲的“本土化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运动、澳大利亚与英国倡导的“课程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美国呼吁的“全面国际化”(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以及全球南方推动的去殖民化课程等；但这些举措的影响通常有限，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未能真正改变国际化的主流模式。此时，排名体系、政府政策与收入创造目标，以及愈加激烈的市场化竞争，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化的核心因素。

新冠疫情并未阻止这一趋势。疫情消退后，全球北方的教育体系迅速恢复“常态”；而在全球南方，国际化呈现两种路径：一方面，在机构层面：发展本土化国际化愿景、强调区域合作、推动去殖民化课程，以及利用数字化开展协作式线上国际学习与虚拟交流；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依旧聚焦国际学生招

生、软实力建设和跨国教育。

国际化被拆解

当下的地缘政治紧张与冲突、反移民与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情绪和政策、以及民族主义，都挑战着回到以往新自由主义式国际化“旧常态”的可能性。各种迹象显示，高收入国家正在远离竞争与市场化：限制或冻结国际学生招生、强调知识安全、终止与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国家的研究合作与学术交流。

这种对国际化的“拆解”趋势变得愈发严峻。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的选举结果，都暗示着这些国家正在拆除国际化。明显的例子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和英国政府采取行动减少国际学生数量，以及欧盟和多国政府推动强化知识安全，即所谓的“负责任的国际化”（但其中“负责任”已不再指对全球社会负责，而是指对“我们的安全”负责）。

一种激进的“撤销”

在全球北方，这种对国际化的撤销，有些人将其视为对新自由主义的撤销，并不意味着回到合作、交流与团结的传统价值观。相反，它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整体的一种激进式拆解。这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与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的预算削减、以及技能劳动力短

缺并行发生——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不利且矛盾的。尽管可以质疑一些全球南方政府的动机，但南方国家的趋势似乎恰恰与北方相反：它们正在发展不再依赖全球北方、甚至与之竞争的国际化理念与政策。

国际化不能脱离当前高等教育发生的整体变革来看。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和我曾在《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中写道：“全球高等教育与研究界，尤其是其领导层，必须意识到当前政治右转带来的挑战，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应对它们，寻求克服的方法。这不仅符合高等教育界自身的利益，更关乎全球社会的利益。把头埋在沙里，是 2025 年及未来几年最危险的做法之一。”这句话对高等教育整体适用，对国际化领域更是如此。

当前的发展趋势为高等教育界提供了一个契机，同时也提出了要求：重新评估并重新构想国际化，使其成为一种具有社会责任与包容性的行动——无论在全球北方还是全球南方。撤销国际化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本身。

注：本文基于作者在 2024 年 12 月 4 日《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上发表的文章的更新版本。

绘制（但尚未解决）科学传播危机的版图

菲利普·G·阿特巴赫、汉斯·德·维特

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荣誉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件：altbach@bc.edu

汉斯·德·维特（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荣誉教授

电子邮箱：dewitj@bc.edu

科学传播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也从未像今天这样陷入困境。在全球化科学的时代，多国合作研发 新冠疫苗便是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之一。能够快速评估并传播科学研究成果已变得至关重要。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高等教育与科研的迅速扩张意味着学术出版物呈指数级增长，而发表成果也成为学术晋升、大学声望以及全球排名影响力的核心指标。

学术体系的规模庞大：全球约有 2 亿名学生就读于 2.6 万所大学及众多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整个体系由超过 1,000 万名学者支撑。

在这些大学中，约有 1 万所属于“综合性”大学，并可能承担一定的科研使命。尽管真正“科研密集型”的大学数量相对较少，且高质量研究主要来自这部分院校，但整体的学术产出仍然广泛且庞大。

由于全球排名对科研产出的强调，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可发表论文的压力显著增加。过去 50 年间，学术出版从专著和图书逐渐转向多作者的期刊论文。

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由新技术、跨国出版商，以及高教部门与出版产业之间新的开放获取机制所推动。学术文章和图书数量呈指数级扩张，这实际上摧毁了传统出

版体系，并引发了一场无法逾越的科学传播危机。

与此同时，面对出版业的高度集中以及其高成本与排他性，人们对开放获取与开放科学的呼声高涨。本文所做的是描绘这场危机的版图，但尚未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

不可持续的扩张

没有人确切知道每年究竟发表了多少科学研究成果，也没有人能准确统计现有期刊的数量。大型学术期刊索引 Scopus 目前收录 22,794 种活跃期刊，来自 11,678 家出版社，涵盖 40 种语言。另一大型索引 Web of Science 在其三个主要数据库中收录超过 14,400 种期刊，并在其新兴来源列表（ESCI）中额外收录 7,800 种期刊。

总部位于瑞士、1996 年成立的开放获取出版商 MDPI，自创立以来已累计发表 100 万篇文章，其中仅 2022 年就刊载了 295,186 篇同行评审论文，分布于其 403 种期刊中。作为开放获取出版商，MDPI 按篇收费，每篇文章约需支付 2,000 美元。

期刊出版行业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格局：既有传统的学术出版机构（包括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商，如 Taylor & Francis 和 Springer，以及大量新加入者），也出现了掠夺性出版商

的增长；此外，还有像 MDPI 这样处于中间地带的出版机构。

尽管开放获取的压力不断上升，但主要学术出版商（主要位于高收入国家、以英语出版）仍然保持统治地位。期刊编辑、编辑委员会成员和审稿人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而且大多为男性，尽管这一状况正在逐步改变。

如今，推动科研传播和发表压力的力量越来越来自中低收入国家。此外，学术晋升体系竞争愈加激烈，常常要求大量发表论文，而并不关注质量。因此，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学者，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其他发表途径，例如 MDPI 或质量较低、收费更高的掠夺性期刊。

图书出版

在过去的 50 年中，由于学术期刊的主导地位，学术图书出版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图书在某些学科领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经历了显著变化。

最初，学术图书多为单一作者撰写的专著。但正如格列柯（Albert N. Greco）的《人文学科的学术出版 2000-2024：营销和传播的挑战与机遇》（*Scholarly Publishing in the Humanities 2000 - 2024: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自然科学，然后是社会科学，近年来也扩展至人文学科，出版重点转向了多作者图书，例如会议论文集、手册以及用于教学的教材。

按需印刷、电子书等技术创新降低了出版成本，使图书出版更加便捷、具有吸引力。此外，现在可以按章节购买内容，而无需购买整本书，这为出版社创造了更多收入来源。然而，这也导致许多作者图书缺乏整体连贯性。

为了压缩成本，出版社往往减少同行评审流程，并将编辑工作外包给印度等地的低质量服务公司。

为了将成本降至最低，出版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出现了质量牺牲。在某种意义上，如今的许多图书更像期刊的合刊，因为它们缺乏统一的结构和连贯性。

与此同时，许多出版社对学术图书及单个章节的定价异常高昂，即便是电子书也不例外。这使得图书和章节的价格超出了个人可负担范围，也给全球南方的图书馆和高校带来严重的采购困难，即便出版社提供折扣也难以缓解这一问题。

竞争加剧

造成这些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文章和图书数量的剧增，其中许多质量堪忧。为什么会这样？学术界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许多高校渴望跻身研究型大学行列

（即使它们实际上更应把重点放在教学与社区服务上），使得“发表”被赋予了不必要的高价值。

结果，整个出版体系面临巨大的压力。开放获取（open access）运动本身也极为复杂，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制造的问题并不比它试图解决的问题少。开放获取的目标当然是让知识对所有人开放，但确实也有一些积极案例，例如某些高校、研究资助机构、编辑委员会等正在努力应对危机并尝试发展替代模式。

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近期发布的报告《开放科学：高校面临的挑战》（*Open Science: The Challenge for Universities*）恰当地将科学传播危机置于更宏观的背景下：高校正在“面临来自政治干预、数字化转型、环境挑战、经费削减、去殖民化进程，以及高等教育日益商品化

所带来的影响等多重压力。”报告进一步询问高校是否将开放科学运动视为“一次共同应对现有不平等、围绕共同原则协作、使知识成为全球公共财富的变革性契机。”

然而，趋势似乎正向相反方向发展。许多期刊和出版社开始从传统的订阅模式转向向作者收费的商业模式。而一些期刊和出版社甚至绕过同行评审程序，几乎“来者不拒”，向市场大量投放质量低下的内容。

没有简单的答案

上述讨论只是触及了这一极其复杂问题的表层。例如，知识的“所有权”究竟属于谁？

是知识的生产者，还是跨国出版社及其他出版机构？英语是否应该继续作为全球科学与学术的通用语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鼓励并尊重以本地主题和本地语言为焦点的研究与出版？

这些问题几乎没有现成的答案，挑战却层出不穷。正如国际大学协会报告所总结的那样，所涉议题范围广泛，需要高等教育界投入认真而持续的关注。

注：本文基于作者在 2024 年 12 月 11 日《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上发表的文章的更新版本。

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出版、合作与引文趋势

马尔顿·德梅特、曼努埃尔·戈亚内斯、盖尔格·哈洛、许心

马尔顿·德梅特 (Márton Demeter)：匈牙利公共服务大学 (University of Public Service)
社会传播系教授

电子邮箱：demeter.marton@uni-nke.hu

曼努埃尔·戈亚内斯 (Manuel Goyanes)：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 (Carlos III
University of Madrid,) 副教授

电子邮箱：mgoyanes@hum.uc3m.es

盖尔格·哈洛 (Gergő Háló)：匈牙利公共服务大学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halo.gergo@uni-nke.hu

许心：英国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xin.xu@education.ox.ac.uk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与科技强国，其
在国际学术研究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也日
益成为关注焦点。尽管中国在工程、医学与科
技等领域的科研贡献已广受认可，但社会科
学领域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少受到系统探讨。
本研究聚焦于经济学、教育学和政治学三个
关键学科，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发展
趋势。研究基于 2016 至 2020 年间共计 8,962
篇被 Scopus 收录的论文数据，从发表状况、
引用情况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分析中国在全
球学术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可从三个相互关
联的维度加以理解：发表趋势、合作网络与引
用实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科学研
究者日益积极地参与全球学术共同体。然而，
这些学科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术知名度
不足、知识生产的相对孤立，以及国内政策导
向与全球学术规范之间的张力。

出版趋势与学科动态

在所分析的三个学科中，经济学的国际

化程度最为突出。中国经济学者在国际知名
期刊上发表论文，并与国际同行开展广泛合
作，这一趋势尤为明显。从高引用率和在全
球学界中不断提升的能见度可以看出，中国
经济学者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上升。由于经济
学研究重点与全球科研议程契合，特别是在
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发展经济学等领域，
中国经济学者更容易与全球领先机构和研究
者建立联系。

相比之下，教育学与政治学的国际化程
度更加有限。中国教育学者往往在国内期
刊上发表论文，或在主要关注中国议题的
国际期刊上发表研究。教育学的出版格局
受到国家政策议程的强烈影响，研究多集
中于解决中国国内教育需求，而非回应全
球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广泛讨论。这种较为
狭窄的研究焦点限制了中国教育研究在国
际上的影响力。

政治学是三者中最具“内向性”的学科。
研究往往围绕中国政治体制、国内治理与
政策议题展开。尽管中国政治学者在国际
期刊的发表量有所增加，但这些文章通常
聚焦于

对全球读者吸引力较为有限的主题，例如中国国内政治结构、国家政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因此，中国政治学者在全球学术共同体中获得认可面临挑战，尤其是在政治与社会情境与中国差异显著的地区。

引用趋势与全球影响力

引用模式提供了另一种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程度的视角。经济学再次表现最为领先，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不仅被国内学者广泛引用，也频繁获得国际引用。这种高引用影响力反映了其研究的全球相关性，例如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及气候变化等问题，均是国际学界高度关注的议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者在国际重要机构和期刊中占据一席之地，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相较之下，教育学与政治学的国际引用表现较为一般。教育学研究在中国国内的引用频率较高，但在国际上的引用率较低，说明其研究成果尚未深入融入全球学术讨论。政治学情况类似：尽管有关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受到一些国际关注，但大部分引用来自中国学者或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者，而非来自欧美或其他全球地区。这表明，尽管中国教育学和政治学的发表数量在增长，其全球影响力仍受限于研究主题的国内导向性。

合作网络与地缘政治影响

国际合作是社会科学国际化的另一项关键维度。过去十年间，中国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之间的科研合作大幅扩展。然而，这些合作的程度与性质在不同学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在经济学领域，中国学者已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与其他亚洲国家、欧洲以及美国的研究者共同开展研究。这些合作促成

了更多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的合著论文，并提升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能见度。

然而，西方机构在这些合作网络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原因包括西方大学与期刊在全球研究议程与学术标准制定方面的历史性主导地位、英语出版的普遍影响，以及西方科研资助的广泛覆盖。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国际合作往往呈现“西方中心化”的特征。

这一趋势也引发了担忧：中国社会科学可能过度依赖西方的学术传统与方法论，从而导致本土视角的弱化，并延续西方学术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政治学等学科中，这种动态尤为明显——偏离西方主流范式、或对西方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的研究更难进入国际期刊发表，从而面临在全球学术共同体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学与政治学等其他学科呈现出更多区域性合作，特别是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合作。中国学者在这些领域常与日本、韩国等在教育制度或政治系统上具有相似性或可比性的国家研究者开展合作。这类合作有助于推动具有亚洲特色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然而，与经济学面向西方的全球合作相比，这些区域性合作虽然具有价值，却在国际能见度与全球影响力方面仍存在局限。

“形式国际化，本质本土化”

本研究的一个核心发现，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形式”与“内容”之间所呈现出的差异。许多中国学者虽然在国际认可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并在引用格式、论文结构、研究方法等方面遵循全球学术规范，但其研究内容往往仍然主要聚焦于国家议题与本土语境。

这种“形式国际化、内核本土化”的现象，反映了中国在推动学术机构现代化、与全球研究标准接轨的同时，仍将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议题置于优先位置。

在经济学领域，这一现象表现得相对不那么明显；相比之下，教育学与政治学更深地嵌入国家政策议程，其研究更倾向于回应国内政策需求，或服务于对中国特有政治体制的解释与理解。

在全球标准与本土优先之间寻求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是一个复杂且不断演进的过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塑造，包括出版趋势、引用模式、合作网络以及地缘政治环境等。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挑战也揭示出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例如：西方研究范式的持续主导，导致中国研究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有限；国家议程的优先性，强化了研究的本土取向；国际合作范围有限，尤其是在与非西方国家的学术交流上仍有提升空间。

随着中国不断巩固其作为全球科研强国的地位，其社会科学需要在全球学术规范与本土知识传统之间寻求微妙平衡：既要遵循国际标准、参与全球学术讨论，又要保持自身独特的知识视角，并为国际社会提供来自中国的理论贡献。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需要：加大对多元且公平合作机制的投入；促进与非西方国家的知识交流与共同研究；消除限制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可见度的制度与结构障碍。只有这样，中国社会科学才能在国际学术体系中占据更具影响力的位置，并在未来的全球知识生产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注：本文基于作者们于 2024 年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经济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的出版、合作和引文模式》一文，较早的版本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在 <https://srheblog.com/> 上以博客的形式发布。

掠夺性出版：动因、后果和道德困境

约翰·穆顿、玛西·范·尼克尔克

约翰·穆顿（Johann Mouton）：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评估、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教授

电子邮箱：jm6@sun.ac.za

玛西·范·尼克尔克（Marthie van Niekerk）：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评估、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主管

电子邮箱：mvn3@sun.ac.za

尽管人们普遍相信（或许也寄予希望）学者在向更广泛的受众发表研究成果时会遵循伦理规范，但多种不道德或欺诈性的出版行为多年来仍不断显现。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在 1942 年提出的“无私性（disinterestedness）”规范，强调科学家应仅以推动科学发展为目的从事研究。这一理想若能得到遵守，便意味着研究活动不应被用于个人获利、自我宣传或谋取个人影响力等目的。

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并非所有科学家和学者都能严格遵循这些规范。学术出版中出现了大量背离这些理想的行为，包括抄袭与自我抄袭、对女性作者的制度性偏见、利用虚假审稿人和虚假评审操纵同行评议程序、使用代笔作者等现象——而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学术界中掠夺性出版的兴起。

本文将回溯掠夺性出版的起源与发展，分析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在结尾部分讨论其对高等教育的更广泛影响。

起源与后续发展

“掠夺性出版”（predatory publishing）这一术语通常被认为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图书馆员杰弗里·比尔（Jeffrey Beall）。他在 2010 年首次提出“掠夺性”这

一说法，并于同年建立了相关网站和博客，由此被视为掠夺性出版的非官方“监督者”。由于长期收到人身威胁，他于 2017 年关闭了网站。比尔的名单现由一位匿名人士保存，而 Cabells 等商业机构也持续整理他们认为属于掠夺性出版商和期刊的名录。

在 2012 年发表于《自然》（*Nature*）的一篇更具系统性的文章中，比尔对“掠夺性出版”的含义作出了正式描述：“随后出现了掠夺性出版商，他们利用作者付费的开放获取模式，出版伪造的期刊，从中牟利。这些掠夺性出版商不诚实、缺乏透明度，目标是欺骗研究人员，尤其是缺乏学术交流经验的研究者。他们建立的网站与合法出版商极为相似，却出版质量可疑甚至极差的期刊。许多声称总部设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但实际上来自印度、尼日利亚或巴基斯坦。一些掠夺性出版商通过垃圾邮件向研究者索稿，却不提前说明需要支付的作者费用。”

比尔的开创性工作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关于掠夺性出版的定义及其普遍性的研究热潮。许多研究可视为比尔工作在科学领域与地域范围上的延伸。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掠夺性期刊的关键特征并未形成共识性的定义。

2019 年 4 月，加拿大期刊学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Journalology）召开了全

球掠夺性期刊峰会。来自学界与行业的参会者草拟了一个共识性定义,并随后发表于《自然》杂志:

“掠夺性期刊与出版商是以牺牲学术研究为代价、优先追求自身利益的实体,其特征包括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偏离最佳编辑或出版规范、缺乏透明度,以及采用激进或不加区分的投稿招揽方式。”

这一定义涵盖了此前文献强调的掠夺性出版的主要特征:将财务利益置于学术之上;伪造或歪曲期刊信息与关键指标;不遵循良好编辑与出版规范;商业运作不透明等。该定义为当前与未来关于“掠夺性”出版的讨论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主要成因与驱动因素

掠夺性出版以及其他可疑出版行为之所以在当代学术界广泛蔓延,主要可归因于两个关键驱动因素。

第一个驱动因素源自 20 世纪 90 年代数字出版的兴起,以及随后出现的开放获取(Open Access)运动所带来的机会。数字化使学术出版系统更容易被利用来谋取个人利益和经济收益。虽然开放获取的出现并非直接导致掠夺性出版商和期刊的产生,但它确实提供了使这类现象得以发生的条件。本文所讨论的几乎所有“掠夺性”特征,如伪造期刊、伪造指标、建立假网站与虚假编辑委员会等,都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和出版从印刷向电子形式转移而成为可能。

然而,开放获取运动与掠夺性出版的并存并不足以解释此类可疑出版行为在全球迅速扩散的现象。第二个驱动因素则与一种深植于整个学术文化中的绩效管理体系密切相关。这不仅仅是过去几十年“发表或淘汰”(publish or perish)文化的延续,而是一种以

新公共管理理念为基础、并通过新的学术绩效评估指标大幅扩张的体系。詹姆斯·威尔森登(James Wilsdon)在 2015 年将其称为大学里的“指标潮流”(the metric tide)。

其核心问题在于:高校中早期的管理主义,与近年来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和替代计量学(altmetrics)的发展相结合,再加上期刊影响因子和 h 指数等指标在教职招聘与晋升中的不当运用,导致学术评价体系日益量化、单一化。学术表现或成功往往被等同于某种分数或指标——更具体地说,是以数量、产出和计数为优先的指标。那些无法简化为数字的学术工作质性价值,例如研究深度、社会贡献、教学质量等,则常被忽略。

南非评估、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CREST)在 2018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让南非学者列出他们认为在获得终身教职或晋升时最重要的因素。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三项因素依次是:在 Web of Science 或 Scopus 收录的期刊上发表;指导并“产出”研究生;以及在高影响力期刊发表论文。同样引人深思的是:参与社区服务和为大学提供服务竟然被评为最不重要的因素。

掠夺性出版的影响

当开放获取(OA)运动的影响与一种高度依赖量化指标的学术文化叠加,再加上鼓励学者尽可能多发表文章、却不考虑质量或诚信的激励机制时,原本出于良好意图的政策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因此,掠夺性出版现象的蔓延并不令人意外。

当某些大学的学者长期持续地从事不道德的研究与出版行为——无论是掠夺性出版、故意参与发表与引用联盟(publication/citation cartels)、虚假署名,或其他形式的不端行为——这些机构的学术声

誉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玷污。此外,如果大学管理层对此类行为表现出容忍或放任态度,不仅会削弱整个学术界对该大学的信任,也会影响校友、资助者等利益相关者,最终损害公众对该机构乃至整个学术系统的信心。除非

学者对这些行为保持警觉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根除,否则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将逐渐削弱,而这将对科学事业的长期发展造成深远的损害。

学生贷款还是所得税：致力高等教育融资改革

马里奥·阿拉尔孔、何塞·华金·布鲁纳

马里奥·阿拉尔孔：智利迭戈波特莱斯大学（Universidad Diego Portales）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mario.alarcon@udp.cl

何塞·华金·布鲁纳：智利迭戈波特莱斯大学名誉教授

电子邮箱：josejoaquin.brunner@gmail.com

2018 年，智利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1.091 号高等教育法》（*Law 21.091*），大幅重构了国家在监管、质量保证与融资方面的架构。改革的核心是从私人支出逐步转向公共支出，将有限的免费教育确立为学生资助体系的基石。这些变化强调了国家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主要监管者、评估者和投资者的不断增强的角色。

2024 年，政府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旨在改革现行的学生贷款制度。该提案试图通过以毕业生收入为基础征收累进税，来取代传统的学生贷款，从而使资助模式与 2018 年改革确立的原则保持一致。然而，这项提案在智利社会和政治领域引发了广泛争议，人们对其可行性及其对智利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抱有不同看法。本文对该改革的潜在影响以及其对体系可持续性的更广泛意义进行了批判性评估，同时也回应了全球关于学生资助的讨论，为如何在“入学机会、成本与质量”三角之间调和内在关系提供启示。

学生贷款体系：合法性危机

智利的高等教育参与率位居世界前列，高于 OECD 平均水平。这一成绩主要归功于 2006 年设立的“国家担保贷款”（*Crédito con Aval del Estado*）。该体系允许学生通过由国家担保的贷款来支付学费。根据智利政府的

数据，该计划已帮助超过 120 万学生顺利入学，特别惠及在私立院校就读的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家庭。

“国家担保贷款”最初设定了严格的条件，例如接近 8% 的利率。随着时间推移，政策逐步放宽：利率降至 2%，月供上限设为收入的 10%，还款期介于 5 至 20 年之间。然而，2011 年的学生抗议活动揭示了该体系的问题，特别是其给家庭带来的沉重债务负担。在压力下，政府推出政策改革，并在 2018 年巴切莱特总统任期内为最脆弱的 60% 学生提供免费教育。

尽管如此，“国家担保贷款”仍应用于不符合免费教育条件的学生。到 2023 年，27% 的借款人仍处于学习或宽限期，另外 73%（约 89.6 万人）已进入还款阶段。在这些毕业生中，78% 完成了学业，22% 未完成。平均月供约 34 美元，未毕业生平均欠款为 3,288 美元，毕业生平均欠款为 6,780 美元。

尽管改革改善了贷款条件，但学生贷款、私人银行的参与及政府承担的高成本等问题仍为公众和政治领域所诟病。越来越多的声音将该体系视为不可持续，并呼吁彻底摆脱以债务为基础的资助模式。

尽管修订改善了贷款条件，但与学习债务挂钩的形象、私营银行作为中介的角色以及政府为此承担的高额成本等因素，使得“国

家担保贷款”体系长期备受批评。公众舆论日益将其视为一种不可持续的制度，强化了对无债务资助模式的呼声。

拟议中的高等教育基金：批判性分析

提议设立的“高等教育基金”(Fondo para la Educación Superior)是智利高等教育史上最具雄心的改革之一。它试图以基于收入的累进税取代传统学生贷款。收入超过 515 美元的毕业生将按累进税率缴纳，最高不超过收入中超过 3,090 美元部分的 8%，缴费期限最多 20 年。通过取消贷款，“高等教育基金”希望减轻学生与家庭的经济负担，并以更公平的方式重新分配高等教育成本。

然而，该提案面临重大挑战。“高等教育基金”依赖政府资金，可能威胁高校的自主性。取消成本分担、引入受监管的收费模式，可能使大学更加依赖政府拨款，从而受制于预算波动与政策优先事项。这种依赖可能削弱机构多样性与自我治理，而这些是满足学术及社会需求的重要基础。

大学的财务可持续性也令人担忧。免费教育政策的经验显示，政府统一设定的学费往往低估真实成本，迫使大学在极紧的预算下运作。据估算，现行免费教育模式造成每年约 1.1 亿美元的收入损失，而“高等教育基金”可能进一步带来 7,000 万美元的赤字。资金限制将影响大学维持质量、应对学术需求增长的能力。

“高等教育基金”基于收入的缴费模式也引发复杂问题，包括受益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对高收入专业人士的潜在打击。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职业税”，它可能被视为沉重负担，促使毕业生寻求私人融资或逃税。系统依赖高收入者补贴低收入者，其再分配逻辑在经济与政治层面均存在风险，可能影响其

长期财政可持续性。

未来考量与挑战

智利正处于重新设计高等教育与科研公共政策的关键节点。明确且又具有战略性的愿景对于协调机构能力与国家目标、确保体系的包容性、质量与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高等教育不仅是一条促进公平准入的渠道，也是培养高级人力资本与知识生产的基石。国家需要制定战略，将这些目标整合起来，明确高等教育机构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角色。同时，资金制度必须在需求面与供给面之间取得平衡。像“高等教育基金”这样的学生端政策虽然促进准入，但如果与高校运行成本脱节，可能危及机构的生存能力。需要采取“双轨式”方案，以确保在不牺牲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公平准入。

目前，并没有充分的技术依据支持以职业税完全取代学生贷款、并限制私人分担成本的提案。相反，该改革更像是一种对学生债务及成本分担逻辑的意识形态反对。在短期内，“高等教育基金”的实施将大幅减少公立大学的收入，其中私立大学受影响最大。中期来看，由于无法保证公共部门能弥补私立部门的损失，体系可能出现质量下降与活动萎缩。

政府必须重申其确保高等教育公平准入的承诺，同时采取更务实、更灵活的方式来设计实施机制。这意味着承认教育贷款作为一种合法工具，可以引入团结性与累进原则；同时保留私人共同支付作为补充资金来源。对于智利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成本分担模式不仅能提高准入率，也能让国家将公共资源更有效地投向最脆弱群体以及国家战略发展的关键领域。

科研经费需要特别关注。智利在研发方

面的投入仅占 GDP 的 0.3%，远低于 OECD 平均水平。弥补这一投入不足，对于强化大学作为创新中心与长期知识生产主体至关重要。

维护机构自治同样是一大挑战。公共资金依赖度增加，要求建立保障大学独立性的机制。大学必须保有对其资源、优先事项和治理的控制，以应对学术与社会需求的变化。实现这一平衡需要透明且负责任的资金机制。

最终，高等教育融资改革必须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来设计。如果缺乏战略对接，政策矛盾可能削弱改革成效，限制长期目标的实现。将明确的国家战略与适切的融资模式相结合，对于应对智利高等教育体系当前与未来的挑战具有决定性意义。

欧洲的非学位教育：终身学习的新机遇

迈克尔·盖贝尔、特蕾莎·张

迈克尔·盖贝尔 (Michael Gaebel)：欧洲大学协会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高等教育政策部门主任

电子邮箱：Michael.Gaebel@eua.eu

特蕾莎·张 (Thérèse Zhang)：欧洲大学协会 (EUA) 高等教育政策部门副主任

电子邮箱：Therese.Zhang@eua.eu

欧盟近年愈发重视短期、非学位教育的重要性。过去，博洛尼亚进程主要聚焦学位结构改革，将现今熟悉的学士、硕士、博士体系确立为欧洲高等教育区域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的标准结构；而如今，愈来愈多的政策讨论和声明围绕短期学习机会的潜力展开，例如微证书 (microcredentials)，以及“提升技能” (upskilling) 与“再培训” (reskilling) 等面向学习者与劳动者的新路径。2020 年《博洛尼亚进程罗马公报》(The 2020 Rome Communiqué of the Bologna Process) 提出，应通过此类学习机会“使学习者能在人生不同阶段发展或更新其文化、专业及跨领域技能与能力”；2024 年《地拉那公报》(Tirana Communiqué) 进一步建议，将微证书纳入既有的先前学习认定体系，并在修订《欧洲学分转换与累积系统用户指南》(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 Users' Guide) 时予以重点考虑。

同一时期，欧盟委员会的政策叙述，特别是在《欧洲技能议程》(European Skills Agenda) 与《2022 欧洲大学战略》(2022 European Strategy for Universities) 中，也明确确认短期学习供给为欧盟层面的政策重点。高等教育并非此类学习机会的唯一提供者；相反，相关趋势强调其他教育与培训体系（如职业教育或其他高等教育类型）、企业及雇主在职业技

能提升与再培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值得强调的是，欧洲许多大学长期以来均向毕业生提供继续教育，并致力于促进包容性与扩大参与，从而在终身学习中发挥关键作用。此外，新冠疫情及其对全球高等教育的影响，也促使欧洲大学进一步思考如何提升学习的灵活性。“灵活性”不仅意味着在各种学习项目（包括学位教育）中提供更多可适应个人需求的学习方式，也包括以非学位学分的形式增加学习选择。

当前状况

目前欧洲高等教育机构的情况如何？欧洲大学协会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2024 趋势报告》(Trends 2024) 显示，71% 的高校已通过学习证书、徽章或微证书等形式提供非学位课程，另有 21% 的高校计划开展此类课程。此外，一半的高校预计未来五年非学位学习者将继续增加，另有 25% 预期学生数量将保持稳定（往往在经历了过去五年的增长之后）。这充分表明，高校正积极回应潜在学习者与政策制定者的需求，并努力在终身学习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不过，各国情况差异显著。《2024 趋势报告》显示，比利时、保加利亚、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葡萄牙、西班牙及瑞士的高校普遍提供非学位教育；但在德国与斯洛文

尼亚, 仅约 40% 的高校设有此类课程。这种差异除了与其他教育和培训提供者的活跃程度有关外, 也与组织和认可此类学习成果的难易度紧密相关。《2024 博洛尼亚进程实施报告》指出, 欧洲高等教育区域中仅少数国家采取了措施, 确保高校所提供微证书的透明度、跨国可读性与可转移性。现行法律框架亦显示, 各国对“微证书”的理解并不一致, 目前仅有十个国家将其纳入国家资格框架。根据《2024 趋势》数据, 欧洲高等教育区域中 63% 的高校认为国家层面的法律与监管障碍是开展短期非学位教育的一大挑战。

挑战

接受调查的高校还指出了更多挑战, 并再次强调了完善监管与资助框架对于组织与认证非学位教育的重要性。其一, 71% 的高校表示难以准确判断此类课程的需求规模。约三分之二的高校也指出, 学习成果认证、适当的资助与商业模式(包括收费结构)同样存在困难, 这一现象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3 全球高等教育终身学习趋势报告》

(*International Trends of Lifelong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中得到验证。高校所提及的其他挑战包括: 课程修读后的学分授予、质量保障措施、课程形式与设计等。

此外, 尽管多数高校预计非学位学习人数将上升, 但 56% 的高校尚无法明确界定非学位学习者的学生身份, 另有 23% 的高校甚至没有相关学生数据。正如欧洲大学协会另一份 2024 年报告所总结, 高校往往试图“在既有资源与组织、监管框架内回应不断增长的需求——即使这些框架并不适合”, 且在缺乏欧盟、国家及校级共同认可的协调方法下, 只能各自为政应对诸如认证、学分授予等本

应集体解决的问题。

展望未来

高校应采取哪些措施, 以实现其扩大非学位教育供给的目标? 目前大多数机构认为学位教育仍将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参照, 但未来的发展并不排除短期学习单元成为独立资格(某些国家已如此), 或作为可累积至学位的模块。高校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 在于现行制度与流程缺乏灵活性, 使得学位体系难以快速调整以配合新的学习需求。《2024 趋势报告》指出, 尽管非学位教育在欧洲高等教育区域已广泛存在, 但发展仍不均衡, 且高度依赖地方与区域背景。

高校需要系统审视自身提供非学位教育的价值、愿景及其与学位教育的互补关系。同时, 与政策制定者及学生共同思考, 如何通过结合学位与非学位课程, 为不同背景的学习者打造更加灵活、多样的学习路径。大学如今可通过多种方式提供教育: 从学位项目, 到毕业生的专业继续发展课程, 再到成人学习者的兼职学习机会, 直至非学位学分课程。大学在终身学习体系中的角色, 也将决定其能否有效回应社会需求, 并培养能够在未来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的毕业生, 使其既能作为公民, 也能作为专业人士, 胜任未来世界的挑战。

注: 本文基于作者的报告《2024 趋势: 转型时期的欧洲高等教育机构》(*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imes of Transition*) , 请见 <https://www.eua.eu/publications/reports/trends-2024.html>。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副主编：王 琪

编辑：吴 燕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800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4458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s://soe.sjtu.edu.cn/Web/Content/76>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ociate Editor: Qi Wang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Address: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4458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s://soe.sjtu.edu.cn/Web/Content/76>